

文人的學術參與

——《復堂日記》所見譚獻的學術評論

蔡長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若是從唐代的奉使記行日記或史官記事日記開始算起，中國的日記傳統已經有一千多年了¹。作為重要的傳記資料，其特色是能從主人日常瑣記中，折射出社會歷史的方方面面。不論撰寫的目的是意在傳世，還是有違主人之意，為人所揭露。日記的內容往往成為後人談藝之資糧，甚至是揭開歷史迷霧的有力佐證。晚清時期，湧現出一批享譽朝野的著名日記，或言學術，或論政事，

¹ 根據清代學者考證，日記的起源約有三說：一是起源於西漢。張蔭桓認為西漢早期有出使日記，如陸賈使越、蘇武使匈奴、張騫導河源等，「博征約記，史佚之耳」。二是推溯於東漢。俞樾認為東漢馬篤伯《封禪儀記》，導日記之先河。三是肇始於唐代。張蔭桓認為太宗時韋執誼出使西突厥，錄所遇諸國風俗、物產為《西征記》，為奉使日記之濫觴。以上三種說法，以第三種較為可靠。當然，也有學者主張在殷墟的甲骨文已經可以看到日記的起源，或者是可以從東晉王羲之的〈蘭亭序〉中看到日記的起源。至於現存日記年代最早者，應為憲宗元和四年（808）李翱排日記載行役嶺南的《來南錄》，時代稍後者則有韋齊修《雲南行記》這樣的奉使紀行日記，又有孫樵《讀開元雜報》這樣的史官日記，或者以記錄特定事情為內容的短篇日記，如劉珂記錄其時政批判的《牛羊日記》。但以上日記之內容，多簡略如備忘錄或便條式文字。所以，從質和量兩方面來說，日記一體具有本質性的展開，還應該從宋代說起，具代表性者，如《歐陽修私記》、《王安石日錄》、《司馬光日記》等。詳細討論，可參陳左高編著：《中國日記史略》（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0年），頁2-3；平田茂樹撰，朱剛譯：〈從《歐陽修私記》考察宋代的政治結構〉，收入朱剛、劉寧主編：《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9-30。

或譚文藝，或記交游，或析軍事，或載掌故，洋洋灑灑，頗值一觀。其中李慈銘 (1829-1894)《越縵堂日記》、翁同龢 (1830-1904)《翁文恭公日記》、王闈運 (1833-1916)《湘綺樓日記》、葉昌熾 (1847-1917)《緣督廬日記》等，皆因獨具特色，而被文人金梁 (1878-1962) 並稱為晚清四大日記²。除了上述之外，尚有許多各具特色、值得探究的日記，例如皮錫瑞 (1850-1908) 的《師伏堂日記》、那桐 (1856-1925) 的《那桐日記》、鄭孝胥 (1860-1938) 的《海藏樓日記》，以及譚獻 (1832-1901) 的《復堂日記》等等。這些日記之中，不乏「以日記為著述」者，亦即有傳於後世的企圖心，所以也就不乏辭采之修飾以及精心結撰的內容³。

《清史稿》載譚獻「讀書日有程課，凡所論著，隱括於所為日記」⁴，表示譚獻的學術精華，記錄在《復堂日記》之中。與許多累累挾數十巨冊之日記不同，《復堂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獨能「情思嬋媛」、「少以勝多」⁵，而所以能不為後世遺忘者，即在於他的文學批評與學術批評。就文學批評而言，作為清代常州詞派的極力擁護者，《日記》為清代常州詞派詞論及譚獻詞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亦早為人所知，故而研究者注意及譚氏《日記》

² 金梁：〈敘〉，《近世人物志》，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62冊，頁3。

³ 按：「以日記為著述」語出魯迅，乃專指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而言，不過譚獻的《復堂日記》亦有類似情況。日記的整理者就說《復堂日記》是譚氏的刻意寫作，所以神思妙筆，情趣盎然，文采斐然。當然，這一部分該如何看待，總是有仁智之見的。例如魯迅就批評李慈銘的日記「志在立言」，甚至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所以就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因為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換言之，此類日記很難說是在「非公共寫作」的心態支配下完成的，難免故作莊重，常常少說私話和隱秘的事情，文字上也有很大的修飾和增補。魯迅：《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308-309；《怎麼寫——夜記之一》，同上書，第四卷，頁24；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後記〉，見〔清〕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21；鄒振環：〈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收入樊樹志主編：《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07。

⁴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44冊，第486卷〈譚廷獻傳〉，頁13441。

⁵ 按：錢鍾書 (1910-1998) 在〈序〉中列舉曾國藩、翁同龢、李慈銘、王闈運諸家日記一一點評，指出不足，最後認為譚氏《日記》「獨能盡雅」，且「情思嬋媛，首尾自貫，又異乎札記之倫，少以勝多，蓋勿徒然」。錢鍾書：〈序〉，見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首，頁2。

者，亦多就其談詞部分言之⁶。不過，譚獻罕為人討論卻更為可觀的，當是他的學術批評。在道問學風氣濃郁的清代晚期，作為一個泛覽博觀的傳統文人，譚獻的知識領域絕非僅侷限在詞學或文學方面。今觀馬賡良 (1835-1889) 序其《日記》，即以為其中「談藝六七，山水、交游間二三」⁷，而譚獻亦自言《日記》「大都循誦載籍，譚藝之言為多」⁸。然所談之「藝」不只是詩文鑑賞而已。誠如整理者所言，《日記》是「半部詩文評加半部讀書劄記的集萃」⁹，其中不乏有經學、史學、子學、小學、金石版本、校刊古籍等的心得體會。尤其評論古今文章流派及學術傳衍，誠懇之中別有慧解，與好友李慈銘之肆意謾罵，不可同日而語。雖於實齋（章學誠，1738-1801）所謂有宗主而不必有門戶者，仍有一間。然而相較於在乾嘉語境之下，許多無視或者嚴厲批判宋學與今文學的漢學家而言，譚獻的評論，批判之際仍留有餘地，如此的論學態度，可謂彌足珍貴。這不但是出自於錢基博 (1887-1957) 父子的觀察，也是筆者研究清代學術有年之後的深刻感受。

譚獻可以說是較早領悟實齋學術精華的清代學者，也是對常州學派能作出較為全面評價的學者。有趣的是，其論定學術之優劣，往往從文章入手，卻又與晚明以來的詩文評點截然異趣，而是立足於實齋所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視野，來評論諸儒經術文章，然後以是否蘊有對經書微意的探索企圖而定高

⁶ 按：學界對譚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詞學理論和詞史地位的部分，而文獻材料則多根據《復堂詞話》。然《復堂詞話》並非譚獻原著，而是門生徐珂 (1869-1928) 在譚獻生前所輯。徐珂於《復堂詞話·後識》云：「光緒庚子 (1900)，珂里居，思輯為專書，請於師曰：『集錄緒論，弟子職也。侍教有年，請從事。』師諾。其年冬，書成呈師，師曰：『可名之為「復堂詞話」。』(譚獻：《復堂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55。)《復堂詞話》一部分內容取自《譚評詞辨》和《篋中詞》，然大部分則是從《復堂日記》中輯得。所以，《復堂日記》可以說是研究譚獻詞學的重要文獻。例如，李劍亮即指出譚氏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著名觀點，實際上是從丁紹儀所言「作者不宜如此，讀者不可不如此體會」的論述轉化而來，其根據就是《復堂日記》多次記錄閱讀丁氏《聽秋聲館詞話》，並借鑑丁氏之說的事實。所以，就研究譚獻詞學而言，《復堂日記》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復堂詞話》。詳細討論，請參方智範：〈譚獻《復堂日記》的詞學文獻價值〉，收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編：《慶祝施塾存教授百歲華誕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91；李劍亮：〈論丁紹儀對譚獻詞學理論的影響〉，《浙江大學學報》第35卷第5期(2005年9月)，頁144-148。

⁷ 馬賡良：〈序〉，見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首，頁7。

⁸ 同前註，卷1，頁1。

⁹ 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後記〉，見同前註，頁418。

下。更重要的是，從《日記》中，我們看到一種評價學術的不同形態與標準。與某些考據學家掌握話語權力後的知識傲慢相比，譚獻在述古論今之間，仍帶有一種溫情與敬意，並且能從更寬廣的視野，以及更高的立足點，來評價他所認同或不認同的學術主張，而非一味的指責或迴護。當然，或許是文人性格使然，譚獻的學術評論裏，總帶有幾分品味與鑑賞的意涵在內¹⁰。這種類於抒情小品，帶有感觀色彩的評論形式，對於向以嚴肅面目為人所理解的經學研究而言，無疑是另一種表現學問的途徑，卻也頗能引起讀者內心的共鳴。更可貴的，我們還可以從譚獻的評論中，看到清代學術不同的面向，這對早已習慣於某一思維定式的我們，頗有攻玉之效，也對我們開拓清代學術研究領域，指示不同門徑。換言之，譚氏這種文人對學術的積極參與，以及頗具感性意義的論學態度與評論風格，對吾人評價清代學術或理解經典研究本身，具有何種啟發性意義？這是潛藏在個人討論譚獻《日記》背後，念茲在茲的大問題，也是在細細品嚐譚獻《日記》之後，得到的最大收穫。

二、譚獻的學術宗尚

傳記資料裏，有不少譚獻學術宗尚的記載，惟多簡略。據復堂〈諭子書一〉所言，譚獻在二十二歲（1853）時，為學使萬青藜（1821-1883）所攜，入北京，得交一時通人，如朱伯韓、葉潤臣、馮魯川、王少鶴、孫琴西、許海秋、蔡梅庵、尹杏農、李子衡、楊汀鷺等，道義得朋，沆瀣無閒。然「諸君固學宋儒之學，傳桐城之文」¹¹，實與譚氏氣類相違。「至於性命骨肉之交，丹徒莊中白為最摯；鄉人吳子珍以公車留京，則舊好也。於是問業焉、切磋焉，予之略通古今，有志於微言大義，皆此二年師友之所賜也，至於今不敢忘。」¹²

¹⁰ 馬慶良〈序〉即言：「仁和譚仲修先生撰《日記》。……其旨趣超曠，詞華簡贍，刻而不露，淡而益腴，則才聲識振，又如山水清音，不煩絲竹已。」（卷首，頁7-8）又《日記》的整理者也說：「《日記》……記學問，也記閑情，記這記那，點綴著極可愛的神思妙語，情趣盎然，文采斐然。會寫文章的學問家的日記，是讀書人案上枕畔的日用品。」（同上書，頁420）

¹¹ 同前註，卷6，頁139。

¹² 譚獻：〈諭子書一〉，見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23冊，頁275-276。按：譚獻在〈明詩〉一文中，詳論文章關乎世運之旨，而以爲「同志友人吳子珍、莊中白皆識斯義」（譚獻：《復堂類集》，收入《半厂叢書》〔臺北：華文書局，1970年影印光緒十五年刊本〕，第3冊，《文集》，卷1，總頁1435）。

又說：「甲寅（1854）年，館山陰（紹興）村舍，始填詞，旋又棄去，後乃尊信張皋文、周保緒先正之言，銳意為之。……吾於古文無所偏嗜，於今人之經學嗜莊方畊、葆琛二家，文章嗜汪容甫、龔定二先生，駢儷尤習孔鼻軒，詩歌嗜吳野人、黃春谷，填詞嗜成容若、項蓮生。」¹³這幾條資料記錄了譚獻而立之前的從學交遊以及一生學術文藝所宗尚。需要注意者，是譚氏自言「略通古今，有志於微言大義」的問學態度，以及其詩歌文章輕古文而好駢體的嗜好之所在。

首先，不論是詞論之尊信張惠言（1761-1862）、周濟（1781-1839），抑或是治經之嗜好莊存與（1719-1788）、莊述祖（1750-1816），都是論定常州學術的主要特徵。蓋於經則微言大義，於詞則意內言外，此常州派之標誌也¹⁴。譚獻自言三十歲之後：「差有窺於微言大義，遂棄前日記誦之所得。」¹⁵故《清史稿》言譚獻：「治經必求西漢諸儒微言大義，不屑屑章句。」¹⁶其次，所謂略通古今者，指的應是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流略之學。簡言之，就是考察學者及著作的性質，並參照學術的發展源流，在予以歸類、列目的同時，顯示其間優劣異同¹⁷。在同治元年的日記裏，譚獻提到自己「洞然於著作之故，文

又吳子珍在〈復堂詩序〉中言：「仲修之學，能通達古今治亂，言天下得失，如指諸其掌，國家大政刑、大典禮，能講求其義，一一可見之實用。」〔清〕吳懷珍：《待堂文》（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影印《叢書集成·續編》第141冊），總頁581。

¹³ 譚獻：〈諭子書一〉，頁281-282。

¹⁴ 譚獻云：「魯川（馮志沂）……謂予曰：『子鄉先生龔定庵言：「詞出於《公羊》。」此何說也？』予曰：『龔先生發論，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內言外之旨，亦差可傳會。』」（《復堂詞話》，頁48）又吳宏一先生在〈常州派詞學研究〉中提到：「據《清史稿》、夏寅官〈譚獻傳〉和譚獻〈亡友傳〉的記載，莊棫和譚獻讀書、治經『必求諸儒微言大義，不屑屑章句』，這種治經態度和以寄託說詞，正是一路。」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06。

¹⁵ 譚獻：〈答林實君書〉，《復堂類集》，《文集》，卷2，總頁1499。

¹⁶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486〈譚廷獻傳〉，頁13441。

¹⁷ 按：從學術發展的角度觀察，清代學術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應是「學術史」學科的建立。也就是章學誠宣導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目的在探討先秦、秦漢的學術變遷，梳理經／史／子／文各種學問的畛域，歸納其理論、建立其獨立價值。因為這門學問頗藉力於漢儒劉向、劉歆的校讎之學，學界遂有稱「校讎學」者，亦有稱「流略之學」者。民國以後學科分類確立，校讎之學三分為校勘學、目錄學、學術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遂名為「學術史」。張壽安：《〈六經〉皆史？且聽經學家怎麼說——龔自珍、章學誠「論學術流變」之異同》，收入田浩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頁274。

章之流別，實自此書（《文史通義》）」¹⁸。另外，譚獻也將《文史通義》奉為鴻寶，時置案頭¹⁹，表示要「治經史未竟之業，得一卷書，附庸于胡石莊（胡承諾）、章實齋兩先生，於願足矣」²⁰。又極力蒐求章氏遺書，為之增補校刻，對《文史通義》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²¹。所以夏寅官（1866-1943）為譚獻作傳，即言：「（譚獻）二十五、六以後，潛心經訓古子，有志於微言大義。……先生淡於仕進，銳志著書，盛推武進莊方耕侍郎、會稽章實齋為當代絕學。」²²則是於常州莊氏之外，別宗會稽章實齋。至於文章之嗜好汪容甫（1745-1794）、龔定庵（1792-1841）二先生，駢儷尤習孔奩軒（1753-1787）者，則自有譚氏視文章關乎學術的特殊見解，既含藏有清中葉以來駢散漢宋異趣於其間，亦所以見譚氏文儒之志在焉。可喜的是，關於這三方面的記載與評論，《日記》中隨處可見。

此處先借助錢鍾書的討論，作為了解譚獻學術宗尚的基礎。在比勘李慈銘與譚獻《日記》之後，對於二人的學術宗尚，錢氏有一番精闢論斷。其言曰：

李承浙西鄉先生之緒，嬗崇鄭、許，訶禁西京之學，以為不過供一二心思才知之士自便空疏（見《日記》）。譚則以越人而顛倒於常州莊氏之門，謂

¹⁸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06。

¹⁹ 按：俞樾致書譚獻云：「子高（戴望）回浙，屬其轉借章氏《文史通義》。子高報稱足下此書時置案頭，晨夕相對，車裘可共，而此或難。不揣冒昧，竊有所請，倘集鈔胥寫本見賜，百朋之錫，殆未足喻。」〔清〕俞樾：〈與談仲修〉，《俞曲園先生書札》（上海：新文化書社，1931），頁19-20。

²⁰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2，頁38。

²¹ 如同治元年《日記》載：「偕子高訪孫夢九司馬，閱其藏書目。予攜《文史通義》歸，閱之。前在京師，借讀葉潤臣丈藏本。洞然於著作之故、文章之流別，實自此書。孫氏所藏為錄本，蓋當時尚未付刻也。視刻本少十之二三，又有論課蒙作文法二十餘條，似刻本所無，又刻本有《校讎通義》三卷，抄本亦無。」（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07）又同治三年《日記》載：「於書客故紙中，搜得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殘本，狂喜與得（周濟）《晉略》同。章氏之識，冠絕古今，予服膺最深。往在京師，借葉潤臣丈藏本，在廈門借孫夢九家抄本，讀之不啻口沫手胼矣。不意中得之，良足快也。」（同上書，《日記》，卷1，頁17）另外，同治四年、十年、十二年《日記》皆有載譚獻訪求及補刻章氏遺書的記載。（見同上書，頁49、56、57、58）他根據多年來蒐集到章氏遺書的各種藏本進行補刻，為浙江書局補刻本，據日本學者考察，在《文史通義》的傳本中，多是這個浙江書局補刻本。參井上進：〈《六經》皆史說的系譜〉，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的社會與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年），頁535-578；王標：〈譚獻與章學誠〉，《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頁65-70。

²² 夏寅官：〈譚獻傳〉，見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頁265。

可遙承賈、董，作〈師儒表〉引冠絕學（見《日記》）。鄙陶子珍之流為經生孱守，欲以微言大義相諷諭（此譚致李書云云，見李《日記》）。此學問徑途之大異者一也。譚既宗仰今文，而又信《六經》皆史之說，自有牴牾，拳拳奉《文史通義》，以為能洞究《六藝》之原（見《日記》）。李則以章氏鄉後生，而好言證史之學，鄙夷實齋，謂同宋明腐儒師心自用（見《日記》），此學問徑途之大異者二也。李書矜心好詆，妄人俗學，橫被先賢（參觀《日記》）。譚書多褒少貶，微詞申旨，未嘗逸口（參觀《日記》）。雖或見理有殊，而此亦德宇廣狹之大異者焉。至於文字雖同歸雅令，而李則祈向齊梁，慮周藻密；譚則志尚魏晉，辭隱情繁。亦貌同心異之一端也。²³

在這則短文中，錢鍾書分析二人學術、文章之宗尚，以及對比二人人品之高下優劣。其言李慈銘學崇許、鄭，訶禁西京，承浙西之緒論；譚獻則心儀莊氏，遙承董、賈，而諷經生之孱守。同時，又諷譚氏拳拳奉《文史通義》，以為能洞究《六藝》之原，是自我矛盾。而李慈銘則以章氏鄉後生，好言證史之學，鄙夷實齋學同腐儒。換言之，李慈銘所排斥的今文與實齋之學，正是譚獻所宗仰者。當然，學問所以觀器識，不在所操持之術，而在心胸之廣狹。以心術言之，同為以文字傳世，李則矜心好詆，譚乃多褒少貶，其間高下，何止上下床之間。至於文字乃表現學術識見之工具，宗尚雖有齊梁藻密，魏晉情繁之異，其疏離於桐城則一也。且觀譚獻之言：

明以來，文學士心光埋沒於場屋殆盡，苟無摧廓之日，則江河日下，天可倚杵。予自知薄植，竊欲主張胡石莊（承諾，1607-1681）、章實齋之書，輔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駢散為粗跡，為回瀾。八荒寥寥，和者實希，中白（莊棫，1830-1878）、谷成（沈善登，1830-1902）其謂之何？疇人中所可哆口者，惟曰有實有用而已。²⁴

譚獻藉由對有明以來文士埋沒於場屋，用心於八股，以評點作文章之態勢，提

²³ 錢鍾書：〈序〉，卷首，頁 2-3。又案：陶方琦為李慈銘高足，淡漠仕途，篤學好古，著書立說從未間斷。專治《周易》鄭注，又習《大戴禮記》、《毛詩》、《爾雅》漢注，兼攻駢文，可為謂漢學思潮下標準的經生。然此等為學門徑，卻是不為譚獻所喜。

²⁴ 同前註，卷 3，頁 58-59。按：譚獻此處本在評論李祖陶之《國朝文錄》，認為「雖圓行墨未拔俗，然持論平實。既排簡齋，亦於望溪有微辭。」（頁 58）認為是編在姚春木《國朝文錄》之上，吳枚庵《國朝文徵》之下。姚選所以為譚獻等而下之者，以其一遵桐城矩矱；吳選所以為上者，以其不事門戶也。

出反省。認為若沒有將此一類態廓清，則江河日下，立杵可以倚天。所以他提出一套文章之法以振救之，即是當以胡承諾、章學誠的通識古今之法治學，而表出以汪中、龔自珍承襲自漢魏之際，能取材於現實，又能自吐肺腑，且風格遒麗富艷，用典屬對精當妥帖的文風，亦即以不分駢散為作文之大道正理以挽回局勢。需知從古文家的立場來看，所謂的不分駢散，其實際仍是一種立足於駢文的立場。然而在桐城派勢力鼎盛的晚清，這種文章主張，並無法引起太大的共鳴。以故譚獻乃言八荒寥寥，和者實希。但他自信在同儕之間可哆口者，就在其文章有實有用而已。故錢基博補充言曰：「譚氏論文章以有用為體，有餘為詣，有我為歸，不尚桐城方、姚之論，而主張胡承諾、章學誠之書，輔以容甫（汪中）、定庵（龔自珍），於綺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取華落實，弗落唐以後窠臼，而先以不分駢散為粗迹，為回瀾。」²⁵則是譚氏文章不主桐城，而別寓駢散不分之意。然原其初衷，乃意在推闡汪容甫、龔定庵從容單複奇偶之間，於綺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的漢末魏晉文風²⁶。若由學

²⁵ 錢基博：〈序〉，見同前註，卷首，頁 5-6。按：邵齊燾 (1718-1769) 在〈答王芥子同年書〉中云：「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麗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為貴耳。」亦即認為惟有將此兩概念縮合起來，才能體現駢文的特色。此說自邵氏提出之後，便得到時人及後人駢文評價的一致認同，成為後來駢文批評的專門話語。譚獻弟子徐珂以為乾、嘉、道、光作家為清代駢體文家之正宗，其中論邵齊燾言：「(邵氏)規撫魏晉，風骨高騫，於綺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一時風氣為之大變。」此蓋漢末魏晉駢體初成，散行未退之特色。朱一新即云：「文章關乎運會，東漢清剛簡質，適如東京風尚；建安藻繪而雄俊，魏武偏霸，才力自與六代不同。」〔清〕邵齊燾：《玉芝堂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81 冊），卷 5，總頁 504a；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8 冊，頁 3888；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卷 2，頁 51a-b。

²⁶ 以汪中為例，學者每以魏晉文章目之。如王念孫云：「余拙於文詞，而容甫淡雅之才，跨越近代。……至其為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蓋其貫穿經、史、諸子之書，而流行於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醞釀者厚矣。」王引之云：「(汪中)為文根柢經史，陶冶漢魏，不襲歐、王、曾、蘇之派，而取則於古，故卓然成一家言。」章太炎云：「今人為儷語者，以汪容甫為善。……彼其修辭安雅，則異於唐；持論精審，則異於漢；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論；而氣息調利，意度沖遠，又無迫窄蹙吃之病，斯信美也。」李詳云：「(容甫)熟於范蔚宗書，而陳承祚之《國志》在前，裴松之注所采魏晉之文最佳，……容甫窺得此祕，於單複奇耦間，音節道亮，意味深長，又甚會沈休文、任彥昇之樹義遺詞，不敢輕涉鮑明遠、江文通之藩籬，此其所以獨高一代。」〔清〕王念孫：〈王容甫述學敘〉，〔清〕汪中著，田漢雲點校：《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 年），〈附錄三〉，附錄頁 60；〔清〕王引之：〈汪容甫

術角度言之，則是欲藉由汪容甫、龔定庵根柢經史，淵雅醇茂之文，而運以胡承諾、章實齋學術之深識，期能振救晚明以來視帖括桐城為學問文章之積風²⁷。

有清一代學術，在嘉道以後分化之大勢，基本上是漢學與今文學二分，經生與文士抗禮。而實齋《六經》皆史之說與流略之學，則在晚清民初之間，有後來居上之勢。蕭穆、胡鳴玉、俞樾、戴望、蔣湘南、沈曾植、姚振宗、鄭文焯、吳昌碩、劉承幹、朱一新、朱祖謀、文廷式、章梲、廖平、康有為、梁啟超、夏曾佑、宋恕、譚嗣同、唐才常、孫德謙、孫寶暄、陳衍、陳黼宸、陳慶年、李詳、章太炎、劉師培、張爾田、柳詒徵、劉咸炘、甘鵬雲、蔡元培，或心折欽仰，或嚴詞批駁，或據以為式，不必待內藤湖南、胡適之繼起，而實齋之說，已籠罩四方矣²⁸。換言之，不論肯否，漢學考據乃當時學者之共業，而實齋學亦在今文學如日中天時，有悄然上揚之勢。值得一提的是，傳布實齋學的始作俑者，是在文士之間有大影響力的龔自珍²⁹，繼其緒而有建樹者，則為

先生行狀》，同上書，〈附錄二〉，附錄頁 50；章太炎：《薊漢微言》，《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58 年），下冊，總頁 958a；李詳著，李稚甫編校：《李審言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1050。

²⁷ 按：有關譚獻對於文章與學術世運相關涉之討論，另有專文探討，參拙作：〈文章關乎經術——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臺北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²⁸ 對於實齋學說為晚清民初學者接受與傳播之相關討論，可參島田虔次：〈《六經》皆史說〉，收入劉俊文主編，黃約瑟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七）》（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85-210；井上進：〈《六經》皆史說的系譜〉，頁 535-578；陳鵬鳴：〈試論章學誠對於近代學者的影響〉，收入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章學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頁 408-426；張榮華：〈章太炎與章學誠〉，《復旦學報》2005 年第 3 期，頁 28-34；王標：〈譚獻與章學誠〉，頁 65-70；張晏瑞：《孫德謙及其校讎目錄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陳秋龍：《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²⁹ 按：最早提出龔氏兼采常州與章氏學術的是錢穆先生，如云：「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經生竊其說治經，乃有《公羊》改制之論，龔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為文，固時襲實齋之緒餘者。」又云：「定庵之學，雖相傳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門徑，則端自章氏入。」參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392、536。陳鵬鳴亦言：「龔自珍與普通今文經學家對《六經》的看法，在表面上確實不同，他的思想明顯受到其鄉先輩章學誠的影響。」「孔子述《六經》所憑借之史，對於周朝來說是『賓』，《六經》為『賓』，孔子亦為『賓』，由此可見孔子『不專為其本朝』而述《六經》。這不就意味著孔子為後世立法嗎？自珍此論，表明了他對孔子的根本態度。」陳鵬鳴：〈龔自珍與常州學派〉，

譚獻。譚氏於常州與實齋學術雖兼有並蓄，然詳論其蘊者尚罕見焉。

較有見地之評論，仍是半個多世紀以前錢基博之言。錢氏序譚獻《日記》，乃從譚氏縮合常州與實齋學術粗述入手，作更細緻的分疏。基本上認為譚獻雖宗實齋流別之學，卻又不主其論學之所依。可以說，比於龔氏的以「賓賓」兼《六經》孔子，則譚氏所論列者，實又與龔氏氣味殊異。其言曰：

以吾觀於復堂，就學術論，經義治事，蘄向在西京，揚常州莊氏（莊存與、述祖、綬甲祖孫父子）之學；類族辨物，究心於流別，承會稽章氏（學誠）之緒。惟《通義》徵信，多取《周官》古文，而譚氏宗尚，獨在《公羊》今學；蹊術攸同，意趣各寄。近人錢唐張爾田孟蓮著為《史微》一書，以《公羊》家言而宏宣章義，實與譚氏氣脈相通。³⁰

細按錢氏之說，蓋謂治經之學，求其大義微言，則譚氏所宗者在常州莊氏；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則以實齋流略之說為去取。惟實齋流略所判，其准在古文《周官》，而譚氏乃代之以《公羊》今學。亦即譚獻雖藉流略眼光評論學術，然其論定之標準為今文學耳³¹。所以，錢鍾書批評譚獻是既喜今文之學，又慕實齋《文史通義》之說為自我矛盾，從這個角度來看，並不成立。其後張爾田繼起，雖援實齋論史學之意，然對其「《六經》皆史」之說亦不愜意，以為無助於說明自孔子以後，《六藝》為經典之事實，以故採今文家觀念，以孔

《江漢論壇》1996年第11期，頁60。另外可參梁紹傑：〈章學誠對龔自珍學術思想的影響衍論〉，收入陳仕華主編：《章學誠研究論叢——第四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年），頁219-242。

³⁰ 錢基博：〈序〉，卷首，頁5。按：受譚獻學術影響，著其名者除張爾田之外，以餘杭章炳麟為最。張氏受之於譚獻者，在於學術上兼采常州與實齋之學，文章亦上宗汪中、龔自珍；太炎先生受之於譚獻者，則實齋流略之學與文章之法，而不受其《公羊》傳承。錢基博云：「餘杭章炳麟太炎，漢學稱大師，治經尤長疏證，得高郵王氏法，自命其學出德清俞樾曲園。然文章之稱晉宋，問學之究流別，其意則本諸復堂者為多。余誦復堂書，其轍迹固有可尋者。」錢氏所謂「問學之究流別」者，指的正是實齋流略之學。錢基博：〈跋記〉，收入同上書，頁414。又按：整理者疑〈跋記〉之文亦出於錢鍾書之手。

³¹ 按：根據今人王標的研究，譚獻雖在咸同之間對彰顯章學誠思想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文集和日記中曾多處論及章學誠。但他自始至終未曾提到「《六經》皆史」這四個字。至於譚獻所欣賞的「官師合一」之論，與其說是源自章實齋，毋寧說是受黃宗羲的影響來得大些。王標並且從今文家與「《六經》皆史」之說，在理論根本上不可調合處，作出譚獻不宗實齋的解釋。誠然，從今文學的立場言之，譚獻可以接受實齋流略學的眼光，然斷不可能接受其「《六經》皆史」之論，而勢必對其做核心觀念之抽換，錢基博觀察到的，也正是這一點。王標：〈譚獻與章學誠〉，頁65-70。

子刪定《六藝》為機制與轉折，提出「《六藝》由史而經」之說，既承認《六藝》為史，為先王之政典；也照顧到孔子以降，《六藝》為經典的歷史事實。所以，錢基博在〈近代提要鉤玄之作者〉一文中，評論張爾田《史微》為：「紹述文史，匡謬拾遺，不為墨守。然章氏《文史》，以《周官》為門戶，嬗於古文；張氏此書，以《公羊春秋》為根極，所主今學。而張氏調停其說，頗多新義。」³²以上二則錢氏之說，既指出譚獻以《公羊》學轉換實齋論說之核心，並且指出張爾田《史微》與譚獻學術觀點的繼承關係，所謂「以《公羊》家言而宏宣章義」、「以《公羊春秋》為根極，所主今學」者，已是對章氏史學，作核心概念之轉換，錢氏所言「張氏調停其說，頗多新義」者在此。在張爾田《史微》及其他相關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如下的思維模式：首先，根據經學今古文之概念論定實齋《六經》皆史之論為古文說；其次，則以今文《公羊》家言取代實齋所主古文《周官》之言，作為其經史關係演變的理論軸心。同時，今文與古文既是經與史之別，也是教與政之別。且教高於政，故潛藏著今文高於古文，經高於史的價值意識。之所以有如此論述，其故在今文家意識深處堅定的經史有別之立場。在他們看來，經為體，史為用，史乃表現經學之形式，至於顯現其間之人文關懷，仍是其經學立場之衍伸。錢基博的觀察，對我們辨章譚氏、張氏的學術根柢，有重要的參考價值³³。

所以，與其說譚氏宗仰實齋《六經》皆史之論，不如說譚氏具有實齋流略學的識見，能以歷時性的眼光考察學者所業之優劣及其在當下的意義。今觀章太炎曰：「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文史》、《校讐》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鑠歆《諸子略》，然不知其義云何。」³⁴太炎先生譚氏高足，而譏其子資質駑鈍，語非厚道，然亦可推知譚氏論學一大利器，在由實齋而識流略也。惟譚氏評價之標準不在東漢許、鄭，而以西京為宗，此在《日記》中，為例甚夥。茲舉二則記載，以見其梗概。如云：

閱《經義雜記》三十卷、〈敘錄〉一卷卒業。臧氏篤實君子，首辟徑途，治經以鄭注、《釋文》為宗，最得師法之正。予既重其深識向、歆父子之

³² 錢基博：《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56。

³³ 相關討論，可參拙作：〈「《六藝》由史而經」——張爾田對經史關係之論述及其學術歸趨〉，《書目季刊》第43卷4期（2007年12月），頁1-29。

³⁴ 章太炎：〈與人論國學書〉，《太炎文錄別錄》，《章氏叢書》，下冊，總頁841。

殊別，董、劉西漢之學，為東京儒者所亂。後人鮮明推究人事之理，學子窮經，究心高密者已少，矧引而上之乎？³⁵

按康熙年間，「漢學」一詞在江南學術圈中雖不再含有宋儒那樣的貶義，然其義類同「漢人之說」或「兩漢之學」，只是與宋學相對照，排他性的意義尚不具普遍性。不過，少數學者已明確崇信兩漢經學，偏重以考據之法解經，而排斥宋儒經解，為推動清代漢學的興起，揭開鮮明旗幟，武進臧琳（1650-1713）即為代表人物。臧氏將讀經心得輯為《經義雜記》，該書雖無「漢學」之名，卻有鮮明的尊漢抑宋傾向，故有「漢學」之實。他自稱「考究諸經，深有取於漢人之說，以為去古未遠也」³⁶。故李慈銘評其書云：「精核訓詁之學，國朝漢學實開其先。」³⁷而劉師培則評之為「樹漢學以為幟，陳義淵雅」³⁸。譚獻亦是從此角度肯定他首闢途徑，治經以鄭注、《釋文》為宗，最得師法之正。但必須指出的是，譚獻此種肯定東漢之學的態度，是基於疏離宋學的立場所做的言說。其實，譚獻更注重的是，臧琳能「深識向、歆父子之殊別」。對於學宗今文的人而言，這種區別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劉向早年即深受神秘思想的影響，繼又參與石渠閣的《五經》講論，濡染於今文經學活動。他論歷代興革、國政得失，基本上都是立足於今文學理論如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作為論證的依據。《漢書·五行志》保存了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的眾多材料，其中多泛論災異跟君主失勢，國家敗亡之間的關係，認為「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于未然」，所以天命可以人力為轉移。如此態度，既是劉向的政治立場，也是其學術上的反映。同樣的，《漢書·五行志》也保存了劉歆論〈洪範五行傳〉的眾多材料，儘管所舉事例不出劉向討論的範圍，然立場則大異。他深信歷代的興衰是按著五行相生的順序來進行，非人力所能逆。這是劉歆在政治態度上跟父親的不同，當然在學術上也有不同的反映。從經學派別來看，劉向治《春秋穀梁傳》，參與石渠閣講論；劉歆治《左傳》，堅持立《左傳》於學官。《穀梁傳》屬於今文經學，《左傳》屬於古文經學。譚獻所言「董、劉西漢之學為東

³⁵ [清]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2，頁45。

³⁶ [清]臧琳：《經義雜記·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72冊，影印拜經堂刻本），卷1，總頁39a。

³⁷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虞雲國整理：《越縕堂讀書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30。

³⁸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左盒外集》，《劉申叔遺書》（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下冊，總頁1537a。

京儒者所亂」，指的正是董仲舒、劉向的今文學傳衍，在東漢以下統系不明的事實。而譚獻肯定臧琳的地方，就在於他能離析西漢之學於東漢許、鄭之外。他感慨於能推究人事之理的西漢之學，後人鮮能明了，更何況學子窮經，能究心鄭玄者已少，矧能引而上之。引而上之者，指的正是西漢今文之學。從這則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楚的捕捉到譚獻學術蘊向之所在。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則譚獻對《尚書》學傳衍的評論，就更能掌握譚獻這種以今文學立場演繹實齋之說的模式。其言云：

閱陳編修（壽祺，1771-1834）《尚書大傳定本》。嘉慶以來，儒者漸講西漢之學。不佞少治《毛詩》，不欲雜後鄭說；治《易》，苦孟氏之學微。《尚書》一不幸遇秦燔，再不幸遇馬、鄭不為十六篇作注，三不幸遇晉人作偽，四不幸而伏生《大傳》北宋後殘闕不完。區區輯集，大義亡失不少。西漢之學，誰其尋墜緒之茫茫邪？前盧氏、後陳氏，亦止考訂之勤耳。³⁹

按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等筆錄伏生授《書》言語，彙編成冊，即為《尚書大傳》。《大傳》雖內容龐雜，然較之語句晦澀的《尚書》本文，卻又淺顯易懂，有助理解上古之事，遂成為學者治《尚書》的重要參考材料。然宋人葉夢得（1077-1148）、晁公武（1105-1180）皆言此書首尾不倫，是宋世已無善本。及至元明，刻本率多訛漏，完本不存。有清一代，學者遍尋諸書，哀輯《大傳》佚文，成者多家。因先後不同，故詳略各異，其中以陳壽祺、皮錫瑞輯本較為完備。換言之，「是書雖由綴拾而稍存概略，然闡明大義，訓辭深厚，除《詩》傳外，為漢世經說之近古者。」⁴⁰按陳氏輯《尚書大傳定本》三卷、〈序錄〉一卷、〈訂誤〉一卷，並附錄〈洪範五行傳論〉三卷於後，力圖再現《尚書大傳》本來面目，其書素以精確詳備，最為學林所盛讚⁴¹。而在譚獻看來，陳氏之輯《尚書大傳定本》，可以視作嘉慶以來，漸講西漢之學的象徵。亦即清代中晚葉學者對今文經典的輯佚工作，存有其特別的義理動機，而非單純的諸說並列以存古注而已。如陳壽祺哲嗣陳喬樞（1809-1869）云：

³⁹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7，頁158-159。

⁴⁰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張舜徽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90。

⁴¹ 詳細討論，可參鄭裕基：〈陳澧整理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評述〉，《中華技術學院學報》第26期（2003年4月），頁232-247；宗靜航：〈讀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偶記〉，《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2期，頁267-280。

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消灰滅，萬古長夜……，苟能夠攷佚文，得其單辭片義，以尋三家今文千數百年不傳之緒，使百世之下，猶知當日幸有三家今文賴以維持聖經於不墜。⁴²

從陳氏的態度來看，他是有意要凸出今文經典的地位的，所以他才會如此的稱許伏生與歐陽、夏侯之《書》，以為若無伏生，則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消灰滅，萬古將如長夜；亦慶幸經秦火之後，猶餘三家今文賴以維持聖經於不墜。所以周予同注皮錫瑞《經學歷史》，遂稱「陳（喬樞）撰《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十三卷，綴輯西漢《今文尚書》經說，殊有繼絕興廢之功」⁴³。而王汎森亦指出，清代中葉陳壽祺的輯佚今文《尚書》，與他的前輩如孫星衍（1753-1818）、段玉裁（1735-1815）對《尚書》的輯佚工作，在意義上有很大的不同⁴⁴。又如李慈銘論范家相《三家詩拾遺》云：「范氏此書……功在翔通大義，使後人得以推求先秦漢初經師微旨，非僅以掇拾繁碎為浩博也。」⁴⁵問題是這種對今文經說的輯佚考定之作，遠未能副譚獻心目中的今文學形象。在他看來，即使是盧文弨（1717-1796）的校定《白虎通》、陳壽祺對《尚書大傳》的輯佚，尚不足與於西漢之學，其故在於區區輯集，不過考訂之勤耳。蓋譚獻對於大義亡失不少的西漢之學，有一份墜緒茫茫，誰能尋之的悵惘與慨嘆。故在櫟括《尚書》歷代傳衍遭遇四不幸的同時，仍不忘強調其治《毛詩》不欲雜染鄭氏東漢之學，又惋惜於西漢孟氏《易學》之湮微。此正筆者所謂以流略眼光評論學術，置於源流正變的框架中來討論學術的優劣，然後以其所歸宗之西漢或今文學為衡量之標準。

可惜的是，罕見學者就譚獻此一兼采二家之學的特性討論之，即使是《日記》的整理者，也不過就譚獻與實齋之關係發揮之⁴⁶，而忽略了《日記》及傳

⁴² [清] 陳喬樞：〈自序〉，《今文尚書經說考》（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第267冊），總頁38a。

⁴³ [清]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頁326。

⁴⁴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7年），頁79。

⁴⁵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中冊，頁577。以下《越縵堂讀書記》若未注明者，皆依此版本。按：甚至有學者認為三家《詩》研究影響了常州今文學派的發展。賀廣如：〈明代的三家《詩》學——兼論清今文《詩》學的興起〉，《人文中國學報》第15期（2009年9月），頁290。

⁴⁶ 范旭倉、牟曉朋在〈整理後記〉中云：「復堂頂佩服章學誠——一位很有思想的大師，想望當他的『附庸』；他的確有實齋的氣象。廣博的閱覽，堅實的述作，使得復堂心胸闊大，眼光敏銳。他深諳文史學術的源流正變，精通文字生活的人情物理——這點要緊，一般迂愚的經生學究或空疏的詞人墨客末由望其項背。令我們翼翼生敬，嘖嘖稱

記所載，以及錢基博父子的重要觀察。實則，僅從《日記》觀之，即可見譚獻對常州經術文章，極盡傾慕之意，每有評論，要亦辭意溫厚，深心遙契，比他欣賞實齋的流略之學，深厚得多。來看一則譚獻的日記：

《宛鄰書屋古詩錄》，十五歲以來所誦習。汀州陷時，書篋盡失。今年常州所刊本，蔣子相貽我，得還舊觀。莊中白嘗以常州學派目我，諧笑之言，而予且愧不敢當也。蓋莊氏一門、張氏昆季、申耆、晉卿、方立、稚存、淵如，皆嘗私淑，即仲則之詩篇又豈易抗顏行乎？⁴⁷

按宛鄰是張惠言之弟張琦（1764-1833）的別號，譚獻自十五歲以來就誦習張翰風所編《古詩錄》，正因年少入門之所據，所以在情感上，總是居於不可磨滅之地。此書咸豐間太平天國陷汀州時遺失，至同治八年（己巳，1869）蔣子相貽新刊本，得還舊觀，由是引發譚氏的一番感懷。莊棫以常州學派視譚獻，譚獻雖謙稱愧不敢當，但這樣的認定是有根據的，除了此處提到私淑莊氏一門、惠言兄弟、李兆洛（1769-1841）、董士錫、董方立、洪亮吉（1746-1809）、孫星衍、黃景仁（1749-1783）之外，《日記》中不斷出現他對常州經學、文學的閱讀和評論，私淑之意，躍然紙上。例如〈過常州〉詩云：「『失憂耆舊盡，珍重百年身。』平生私淑之所寄也。」⁴⁸又在評論徐廷華「詩華實具情，文生雅音」的同時，也不忘感嘆「陽湖、武進誠才士林淵矣」⁴⁹。再如評常州詩人黃景仁詩云：「閱黃仲則《兩當軒詩》。天才既超，風格矜重，生氣遠出，而澤於古，當時果無第二手也。」⁵⁰其閱陸祈孫（繼輅，1772-1834）《合肥學舍札記》則言：「談藝之言，溫粹無鄙倍，所謂常州派也。予聞《安徽通志》成於陸氏，體例文采皆無足觀。因知公家言不無徇奪，恆不副其所見。」⁵¹可謂因愛常州而曲為開解。譚獻於清代文章選本，最服膺李兆洛《駢體文鈔》不分駢

羨。那時候大家忙乎文字考據，而復堂覺得『以訓詁小學治經適得其末』，『聲音訓詁日益加密而傳會虛造之病以起』，討厭迷戀工作而忘掉目的的『小學』，而致力於『表微之學』，『尋求治亂之本』——他畢生研究《釋史》、《董子》，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都懸『有用』為極致。」（頁 419）按：這裏對譚獻學術主張的評論，其實是以實齋掩常州，而未能稍作分疏，觀乎錢鍾書之〈序〉，即可曉然。

⁴⁷ 同前註，卷 2，頁 44。

⁴⁸ 同前註，頁 48。

⁴⁹ 同前註，卷 6，頁 133。按陽湖、武進本為一縣，雍正四年析陽湖於武進之外，辛亥後再合為武進，即世所謂常州派之核心區域。

⁵⁰ 同前註，卷 2，頁 44。

⁵¹ 同前註，《補錄》，卷 2，頁 327。

散的主張，譚獻不但數度與莊氏後人莊仲求 (1834-1879) 同校《駢體文鈔》，自少至老更是數次評點《駢體文鈔》，載在《日記》中，而語脈情溫。如言：「校《駢體文鈔》。是書予二十八歲時初評識於閩中者已亡失，光緒乙亥再評於金陵貢院，閱五年庚辰，三評於全椒官舍。……先是，戊辰、己巳間家居，交武進莊仲求，傾衿談藝。仲求讀書最精密，校本盈數篋，尤致力者《三國志》，是書則與楊佩瑗同校讀。……人事匆匆，久欲傳寫未果。分張十五年，是書未嘗不在篋，再三論文，卒未一一讎勘。衰病歸休，杜門息影，稍理故業。時仲求官閩溘逝數寒暑矣，鄰笛酒壚，徒有腹痛。以同岑之好，重與佩瑗游，析疑望益，歡若當年。戊子秋晚，得假佩瑗舊校。是編點勘研精，然否異同，蠅頭茂密。……是書溫故，兼旬卒業。老作長（恩）〔思〕，病餐特健，聊書本末，以識因緣。冷淡生活，憾吾仲求天上修文，無復賞析。」⁵²在《日記》中，譚獻先後八次提到校對《駢體文鈔》，其稱許莊仲求文章，亦因莊氏熟於《駢體文鈔》之故也⁵³。

光緒十九年三月，老邁的譚獻收到莊仲愚寄來新刻莊存與、莊培因、莊述祖、莊綬甲的遺書，他很認真的與自己所藏對照一遍，指出那些是新刻，那些則未收，一部部莊氏遺書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卻是充滿感傷。他想把自己收藏莊氏《遺書》中未刻者，交給莊仲愚，畀之全刻⁵⁴。可惜或因年事已高，事終未成。對常州莊氏一系學術推之最力者，前有李兆洛，後有譚獻。今觀蔣彤《李兆洛年譜》道光十九年九月下載：「（李兆洛）赴龍城書院，院西為先賢祠，祀季子而下六十有八人，先生率弟子輩瞻拜，惻然曰：『前人創此基業，後人豈忍廢之？亟宜與守令議，且補入莊宗伯、張皋文二人。』」⁵⁵而譚獻評論錢林《文獻徵存錄》，除了推許此書「足以識學問之原流、文藝之正變」之外，仍遺憾有失收之處。故末言：「所欲增補者，如莊方耕、葆琛二先生，附以宋于庭；張皋文傳，附其弟翰風之類。」⁵⁶譚氏私淑常州之心，與李兆洛宗

⁵² 同前註《日記》，卷7，頁178。

⁵³ 如言：「莊仲求遺文數十篇，安徐組練，文質相宣。往時手校《駢體文鈔》最為詳審，宜其述造雅有淵源。」即使為莊仲求寫小傳，也要出之以常州文格，皆所以見譚獻對常州經術文章的喜愛。同前註，卷8，頁204、《補錄》，卷2，頁307。

⁵⁴ 同前註，《續錄》，頁368。

⁵⁵ 蔣彤：《清李中者先生兆洛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卷3，總頁190-191。

⁵⁶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74。

仰鄉先輩之心，何其相似！附帶一提的是，江藩（1761-1831）《漢學師承記》，不列莊氏其名與書，以為不足以入學術之林，而被葉德輝（1864-1927）批評為「殆有彼哉之意」⁵⁷。錢林《文獻徵存錄》一如江藩，出以漢學家視野，所錄亦不能盡如人意，此蓋潛藏學閥意識，有意為之歟⁵⁸？抑亦漢學勢大，學者有一葉障目之蔽耶？

三、譚獻對漢宋學的評論

清代以來，「漢學」一詞使用很廣而語義不同。大抵可分為兩個概念，其一為彰顯於清中期的傳統漢學，相對於宋學而言，偏重考據研究，近代學者多沿用此意；另外則為十八世紀以後產生於歐洲的西方漢學，即 Sinology，本意為中國學，中譯時借用了「漢學」一詞，內容包括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術、文化和社會等所有研究，不限於考據。譚獻因身處在乾嘉漢學大潮的慣性底下，所以《復堂日記》中載有大量關於漢宋學術的評論，若略作分析的話，主要是在清代漢學語境底下的漢宋優劣論述。簡單說來，譚獻歸宗西漢之學，論學每以大義微言是準，然於清代漢學之業，尚能平情論其精粗，至於宋學，則語多不喜。又以文人習性，喜從文章駢散寓其漢宋優劣之論，是以對宋明學術乃至桐城文章，少肯多否。雖然如此，譚獻對諸家學問在高下肯否之間，每輔以實齋流略眼光見其源流正變，故其所擬，確有可採之處，要非全然私見，頗值吾人深思。可惜正如王標所言，作為經師和文士雙重身分的譚獻，他在經史之學方面的成就實際上罕為人稱道⁵⁹。個人以為，除了為其在詞學與詞史上的成就所掩之外，與其議論和主流話語背道而馳，大有關聯。

在學術上，儘管譚獻同樣精於考據，熟讀《說文》，善於校刊，但他更認同常州的經術文章與實齋的通識古今。所以高下抑揚之間，每在彼而不在此。例如他曾撰〈師儒表〉，分十一類品第清代著名學者。首列「絕學」，以莊存與為第一人，其后列汪中、章學誠、龔自珍。次列「名家」，則惠棟（1697-1758）、江聲、王念孫父子、錢大昕（1728-1804）、王鳴盛（1722-1797）。「大

⁵⁷ 葉德輝：《經學通語》（民國四年 [1915] 刻本），頁 7a。

⁵⁸ 又譚獻亦批評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經學』出江鄭堂《師承記》，而去取更不鑿人意」。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 2，頁 53。

⁵⁹ 王標：〈譚獻與章學誠〉，頁 70。

儒」居三，則是顏習齋 (1635-1704)、李恕谷 (1659-1733)、王源、劉繼莊。而清初顧、黃只列入「通儒」第四，且非第一人，居首者是名不見經傳的胡承諾。至於今人推崇之戴震，只列居第六之「經師」，且譚獻對戴震時出諷刺之言，以為其學問只是第二流之高者。另外，譚獻所以列莊氏四人於「絕學」之因，與其學問乃由文章表現之看法關係密切。譚獻這種從文章角度論學問之優劣，與乾嘉以來由訓詁考實定甲乙之風尚不相得。是以不難想像其議論在漢學語境之中，難以得到時流之認同，成為共譜一代學術的大文章，終究沉埋故紙，無法成為後人理解清代學術的重要資糧。

但是，譚獻這種學術與文章互為表裏的評論方式，對現代學術分科下只側重經學或文學的研究者而言，可謂視野更全面，也更具啟發性，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例如他對有清一代學術演變的評論，就是先從文章之士的學術議論談起，而後論乾嘉經學興盛之由，乃至當時文章的特出之處。與眾人習慣的，由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以考據學為正統所建立的敘述模式頗不一致，卻同樣有啟發之處。他說：

本朝學術蓋嘗三四變矣。開國之初，人才皆明代之遺，議論志趣，略尚文辭；又好言經世，祇為幾、復兩社餘波。⁶⁰

譚獻分別從在野與在朝兩方面評論這些「略尚文辭，好言經世」的幾、復餘波。認為當其時，經史大誼，尚無塗轍，偶有從事，炫世而已，並非實事求是。代表人物是朱彝尊 (1629-1709) 與毛奇齡 (1623-1716)。然前者乃文章之士，於經生之業並不專門；後者雖天挺軼才，能催陷廓清，有功聖學，卻日以心鬥，不軌於正。遺民如梨洲、亭林，自是祥鸞威鳳，然議論之間又襲宋人餘唾，亦多無用之言，而有門戶之習，故不足以師表百世。至於易堂九子，徒以虛聲相煽，就中唯有彭士望勉強可言學問。不若顏習齋、李剛主實踐樸學，折衷《六藝》，能為命世之儒；而王崑繩、劉繼莊，推究世用，足為羽翼。如此評價，也難怪〈師儒表〉會置顧、黃於顏、李、王、劉之下，而以為易堂九子不足論。至於廟堂之上，湯斌雖功在治民，然大臣風義未昌，魏裔介、魏象樞則無學問可道。又理學後裔如熊賜履、李光地輩空談心性，陸隴其則徒爭私見。可以看得出來，譚獻對清初學風的整體評價不高。其時經史之學，尚未有專門名家；而議論之間，則空談心性，襲宋人餘唾；至於人品心術，或門戶之

⁶⁰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1，頁18。

習，日以心鬥，或虛聲相煽，徒爭私見。譚獻乃謂：「遂至束書不觀，而學遂一變。」他說：「厭其鄙倍者，於是乎從事墳籍以搜討遺佚，求未見書為事，所樂講者，山經地志、別集野史之屬，事倍而功半，徒以博淹雅之名而已。」在譚獻看來，清初至乾隆初葉，是一代學術最黯淡的時刻。學者雖厭前輩學術鄙倍，能搜討墳籍，卻因學無途徑，只博得淹雅之名。譚獻乃謂：「儒林、文苑，兩無所歸，承學之士，文采黯然矣。」然否中見泰，此事物之理，學術之興起，亦賴有淹博為累積。故譚獻又言：「惠氏一門，即於是時萌芽經術，故餽釘委瑣之習漸衰，而《六藝》古學起矣。極盛於乾隆季年，益精於嘉慶，遺經端緒皆有條貫，六書、九數如日中天，於是乎有清之學，跨越千載，由唐以來，不愧儒林之傳者，惟今日耳。」同時，表現經學的文章亦有可觀。他說：「以文辭言，乾嘉時，經生文士實有淡雅醇古，抗顏行於先秦兩漢，朱右、茅坤以來，十家八家之焰亦以稍熾，則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矣。」⁶¹從這兩則評論看得出來，譚獻對由惠氏開其端緒，興盛於乾嘉時代的治經之業給予了頗高的評價；對當時經學家的文章，亦是擊節贊賞；而對古文選本之學，頗有鄙薄之意。對清代文學史稍有涉獵之人皆知，乾嘉文壇有尖銳的駢散之爭，表面上是擡高漢魏駢文，貶斥唐宋八家及桐城派古文，其實還隱含有一層文章所承載（漢宋）學問優劣之意識在內。譚獻「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的感慨，隱約含有漢學壓倒宋學的慶幸之意。顯然，在漢宋立場上，譚獻旗幟鮮明的站在漢學家這一邊，定格在乾嘉時期的經術文章之上。要之，譚獻也承認清代經學並非平地拔起，而是濫觴於明代遺老，諸老雖性道文辭遠勝其經史造詣，然華路之功，不可掩也。但畢竟與「由唐以來，不愧儒林之傳」的乾嘉漢學，不可同日而語。以上，是譚獻對清代學術優劣與演變的基本認識。譚獻雖然承認經學之起與清初諸老的關聯，但顯然對其時心性學問與經世文章，評價不高。此外，則是對乾嘉經學與文章的贊美，以及對唐宋古文及其代表學問的排斥。這樣的態度，基本貫串於《日記》之中，雖小有出入，然大體則同。

例如他對清初學者，最為推許胡承諾，顧炎武、黃梨洲與之相較，大有不如。如言：

讀《釋志》六日一過。胡先生粹然一出於正，可見施行。視亭林更大，視潛齋更實，視梨洲更確，視習齋更文。遺編晚出，知者蓋鮮，顯晦之數，

⁶¹ 以上引文俱見同前註，頁 18-19。

其有待耶？⁶²

讀《釋志》。〈大臣〉、〈名臣〉篇，眞宰相方才有此言，非經生故紙堆中眼界也。梨洲老人洞見古初或勝之，確鑿可見施行，無少滯礙，則不及，無論亭林之囿於漢唐者矣。⁶³

有清一代，究心胡氏之學者，始於乾嘉間常州兼學者文人於一身的張惠言與李兆洛。譚獻既心儀常州，則欣賞石莊固然。按石莊為崇禎舉人，入清不仕，究心學術。其《釋志》，譚獻評之為「通儒之言，有體有用」⁶⁴，「言性道者，樸屬微至，推究本末；言治理者，黃鐘大鏞，重規疊矩」，以為「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的命世之儒，而嘆其「生當陽九，未見施行」⁶⁵。可謂推崇備至，有清一代學人，唯莊存與可比肩，即使章實齋，仍無此譽⁶⁶。至於梨洲與亭林，則遠不及矣。其故在譚獻評論經術文章，以氣象闊大，博通兼綜為高下，此蓋有其自身學術理念之投射，不必當是非之準。然吾輩於復堂高下之間，所當反思者，在於能否自覺識見之寬窄，而能虛心開括區宇，不再畫地自限。以論清初，厥惟顧、黃；以論乾嘉，不出戴、段，此則吾輩有得於譚氏之議論者。

再則，梨洲、亭林之間，譚獻亦有高下。如云：

閱黃梨洲先生《今水經》，此為通儒徵實之學。貞元之交，儒林推黃、顧。然《待訪錄》推究治原，上窺三代，既勝《日知錄》之雜於名法；《今水經》脈地志里，尋求禹迹，亦勝《肇域志》之淪於簿書。聖緒學脈，安得不以南雷稱首。⁶⁷

若以學脈傳承來講，清代漢學考據之業實是近於亭林而遠於梨洲。但是在譚獻

⁶² 同前註，卷2，頁35。

⁶³ 同前註，《補錄》，卷1，頁227。

⁶⁴ 同前註，《續錄》，頁405。

⁶⁵ 同前註，《日記》，卷1，頁27。

⁶⁶ 有關胡承諾之學的詳細討論，可參凌玲：《胡承諾《釋志》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胡承諾之學雖於後世不顯，但其學於明末清初之時，仍頗有一席之地。如《清史稿·文苑傳》謂胡氏之學「原本道德，切近人事，為有體有用之學。」考其《釋志》，有〈明道〉、〈立德〉、〈養心〉等暢曉性理之篇，亦有〈租庸〉、〈治盜〉、〈兵略〉、〈軍政〉等察政議事之論，因此凌玲認為《釋志》一書「這樣觀照全面以及類似於先秦諸子論述方式的著作，實不多見，且其於原則性的闡述中，亦不乏具體的落實，稱《釋志》為體用兼備、成一家言之作，蓋不為過也」（頁2）。

⁶⁷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5，頁117。

看來，不論就探求治道或徵實之學來講，梨洲的學問都要優於亭林。另外，在章實齋的浙東浙西譜系中，以黃梨洲代表浙東，而以亭林代表浙西。實齋自許學承浙東，而以戴震出自浙西。如此分疏，已然將漢學考據之業上承亭林學術一脈。然而譚獻在討論浙東浙西之時，卻不將亭林列入⁶⁸。是因專就浙籍學者而論？又或對亭林評價不高之故？以譚獻對實齋流略學之推崇，不應於此大關鍵處有疏忽。此中微意，耐人尋味。若進一步推敲，即可見譚獻實欲破江藩以來所建立之漢學系譜，而另外寓有學術優劣之設準於其間，此在譚氏論乾嘉時，最見分明。當然，譚獻也並非漠視亭林對乾嘉諸儒的影響，只不過言語之間，不是那麼尊敬而已。如言：

閱顧亭林《唐韻正》，歎為絕作。音論中說轉注，欲破涇長（許慎）成說，以聲為主，此則無事自擾。然亭林為古學開山，江、戴、段、王、孔、劉密益密，精益求精，不能不奉為初祖，繼往開來，豈小儒也哉？⁶⁹

按譚獻論轉注，最服王鳴盛〈六書轉注說〉的半意半聲之說，以為西莊之論最得古義。王氏〈六書大意〉認為：「轉注從意而轉，加之以聲。凡《說文》中从某某聲而所从之字為象形者，形聲也；所从之字為會意者，皆轉注。」⁷⁰譚獻認為：「此則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不至為枝詞長語矣」⁷¹。至於顧亭林以音聲論轉注，強調以詞源上同韻或同聲的字，即意義相同而聲韻也相同或相近的字互為轉注，很容易混於假借，或淆於形聲，所以譚獻批評他「此則無事自擾」。然而亭林古韻十部之分，允為清代音學開山，後來之江、戴、段、王、孔、劉雖持論益密，仍不能不奉為初祖。故曰：「繼往開來，豈小儒也哉？」

同樣的，他對閻若璩（1636-1704）的治經之業，也是肯定之中帶有批評。如言：

閱《潛丘札記》畢。閻徵君之研經，可謂葦路藍縷，且時雜方言，未免有不文之誚。斷斷好爭，最敬亭林，亦有微詞；最詆堯峰（汪婉），頗似吹索。⁷²

可以看得出來，譚獻對清初學者的傳經之功皆加以肯定，但這並不意味他認為

⁶⁸ 同前註，《補錄》，卷1，頁208。

⁶⁹ 同前註，《日記》，卷1，頁27。

⁷⁰ [清]王鳴盛撰，迺鶴壽校：《蛾術編》（臺北：信誼書局，1976年），第2冊，卷15，頁594-595。

⁷¹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18。

⁷² 同前註，頁309。

亭林、百詩一脈是學問的最高境界。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譚獻大量的月旦乾嘉學人的話頭裏，品出不少他個人的學術興味。

乾嘉諸儒中，譚氏於惠氏是肯定中仍帶有批評，於戴震則視若土苴，於錢大昕、王鳴盛則語帶推崇。另外，在譚獻的《日記》中，留有大量校勘古籍的記載，多為對前賢與時輩校讎古籍精粗的評論，體現出譚獻深厚的校勘學素養。由於能精熟於運用高郵王氏父子之學，故討論之中亦每帶推許之意。至於江藩《漢學師承記》所擬構的經學傳承，以及顯現其中的學術意識，則為譚獻所痛詆，以為不足以代表一代之盛業。以下依序論之。如言：

閱《九經古義》。大都是正文字，未及大義微言，於「古義」之目未滿分量耳。⁷³

如前節所言，譚獻治經蘄向西京，歸宗常州莊氏，以講究微言大義為歸趨。所以他對臧琳能釐析董、劉西京之學，給予高度肯定。至於治經仍停留在搜討古義，是正文字層次的著作，則不會有太多好評，當然也就不會放上太多心思，以故《日記》對於惠棟的評論並不多見。與此相反的是，《日記》中有不少對戴震的評論，且幾為全面否定之語。如言：

子高（戴望）前日有一書與予，爭東原為本朝儒者第一。予不答。此事非一人私言，予故品東原為第二流之高者。⁷⁴

適日與子高辨。東原雖博大，不得為第一流，而子高顧篤信其《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附和前哲，必推為集大成之賢。其與升朱熹為十哲之見相去幾何？⁷⁵

閱戴東原《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子高服膺最篤，予徇其意，乃一究心。東原所學，校之俗儒信有原本，而持之有故，尚未足以推見天人之事。終不能附和耳。⁷⁶

這三則《日記》具有嚴肅的意義，牽涉到譚獻對清代學術代表性的認同，與之相配合的是，對人物的高下品評。譚獻認同的是能推見天人之事的大著作，也就是說，從對經典的政治論述中，體現出聖人與天道的緊密結合。在他看來，能達此境界者，有清一代，唯莊存與當之。（詳第四節）而東原雖博大，較俗

⁷³ 同前註，頁 312。

⁷⁴ 同前註，《日記》，卷 1，頁 4。

⁷⁵ 同前註，《補錄》，卷 1，214。

⁷⁶ 同前註，頁 222。

儒信有原本，持之有故，然所為不過與理學家較勁，辨析心性於毫釐之間，終不得為第一流⁷⁷。所以他對戴望附和前哲（指江藩），必推東原為集大成之賢的態度，相當不滿。乃言：「與升朱熹為十哲之見相去幾何？」在當時，程、朱之學頗招輕視，信口道其是非者多矣。然而戴震，或者說舉戴震為旗幟的漢學勢力，卻擁有廣大的支持者。推東原為當代第一流，當然不止戴望一人而已，所以譚獻反對的，是一個甚至是幾個世代集體的聲音。譚獻所言是否不刊，要亦另當別論，然而能獨出眾流，保有自身學術意識的獨立性，亦足多矣。

譚獻不獨不滿意於戴震的學問，也不滿意戴震的文章。曾說：「文章之奧，恐東原尚見其表耳。」⁷⁸在他看來，戴震文章乃空言，所謂雜文樸儻，腐木濕鼓者。他說：

偶思取味經、容甫、巽軒、實齋、珍藝、申受、保緒、定庵諸家文錄數十篇以為讀本，既復思夙昔疏於東原，未嘗卒業，其書子高盛推之，往復三四矣，發子高書篋有戴集，因先檢段若膺《年譜》閱之，《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辨正宋、明鄙說，信有摧陷之力，然為空言一也。剖析窮於豪芒，語多則不能無得失，其〈說命〉、〈說才〉，予亦未遽謂然，雜文樸儻，不免腐木濕鼓，非莊、汪諸家比。⁷⁹

按段玉裁曾恭維其師戴震為「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⁸⁰。觀其

⁷⁷ 按：章學誠〈書朱陸篇後〉云：「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詳見〔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上冊，頁275。揆諸譚獻所言，既有意掩蓋戴氏訓詁名物之成就，亦為章氏所批以空說義理之見視戴震者。必須指出的是，戴震雖以精密與博學的考證學者形象活躍於當世，然而以轎中人自居的戴震，其實是以終結理學為目的來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為了完成此一目標，戴氏在方法上系直接切入理學系統核心所在「理」這一概念：除了一方面從哲學詮釋上的謬誤性與文字學解釋上的無效性來消極地反駁理學家之「理」，另一方面則在批判的過程中，積極地發展與建構他自己的哲學系統。但是戴氏在這一方面的成就，顯然不為譚獻所認同。有關戴震終結理學的方法與目的之詳細討論，可參丘為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頁101-102。

⁷⁸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1，頁7。

⁷⁹ 同前註，頁20。

⁸⁰ 〔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清〕戴震：《戴震集》（臺北：里仁書局，

所推挹，乃是以全才視戴震。然而對戴震學術有極高評價的章太炎卻指出，戴氏因地處高原，民生勤苦，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蘊藉，頗不便於文士之發揮⁸¹。太炎先生譚獻高足，雖以小學推戴氏為儒宗⁸²，然其治學亦不廢文章之業，而主齊梁之體表漢儒之經術，蓋亦源自譚獻之說⁸³。今觀譚獻所取以為讀本者，即莊存與、汪中、孔廣森、章學誠、莊述祖、劉逢祿、周濟、龔自珍諸家之文。而有經術能文章的這些人，才是譚獻心目中理想學者的範式。從文章風格來看，或駢儷典雅，或簡直清剛；從文章內容來看，即使宗尚有別，或論政治興廢，或演學術流變，多關乎經義典章，與戴震集心力與宋、明儒爭勝者，大相違異。在譚獻看來，宋明儒之學，是當去之而後快者，高明者置之於不議不論之列，而戴震仍糾纏其中，毋乃境界不高，不遭鄙棄亦難矣⁸⁴。

文章而外，戴震訓詁考據之學，乃至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皆遭譚獻否定。按戴震釋轉注為互訓，而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為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為注，互相為訓，古今語也。」⁸⁵即是將意義上相同或相近的字互引解釋。梁啟超贊說：「六書之最難解而聚訟者莫如轉注，（戴）先生釋轉注為互訓，實千古創見。」⁸⁶劉師培也說：「轉注之說，解者紛如，戴、段以互訓解之，此不易之說。」⁸⁷然譚獻於此說最不喜，以為「與其信戴，無寧用良庭《六書說》矣」。又說：「六書為四體二用，創自戴震，群然和之；不顧文義，不識是非，吾嘗恨之。乃讀定庵先生〈家塾策問〉，亦為是言，豈欲發難

1980年），487。

⁸¹ 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冊，頁158。

⁸² 丘為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頁34-37。

⁸³ 章太炎：〈清儒〉，頁158。

⁸⁴ 袁枚言：「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為文章，非序事疇咨，即用筆平行，于剪裁、提挈、烹煉、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于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為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蓋暗諷東原不懂作文之法，雖勤於翻檢，然深思細味文章之功卻少，即是胸多卷軸而藐視詞章之故。按袁枚專就文章經營之法的層面批評戴震，與譚獻從採持之術來批評戴震者異趣。故知譚獻雖被視為文人，然其重視前人文章者，多不在形式，而在內容。〔清〕袁枚著，王英志校點：〈與程載園書〉，《小倉山房續文集》，卷30，《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冊，頁525-526。

⁸⁵ 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戴震集》，頁74。

⁸⁶ 梁啟超：〈戴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第7冊，頁81。

⁸⁷ 劉師培：〈轉注說〉，《左盦集》，《劉申叔遺書》，下冊，總頁1232a。

以待後人之正定歟？迺鶴壽乃曰『自漢以來傳誤已久』，敢為此言，豈非無忌憚之人！」⁸⁸憤恨之情，可謂溢於言表。

另外，戴震的《經考》，譚獻也以為未及莊述祖《五經小學述》、《載籍足徵錄》為有家法，乃至諷刺「戴氏勇於著書，勤恁不可及也」⁸⁹。至於江藩對戴震在乾嘉漢學地位的論定，甚至是以戴震為中心所建構的傳經系統，譚獻皆不予承認。他說：

閱《漢學師承記》。予嘗取《學海堂經解》別擇為〈國朝經義表〉，暇當更撰「國朝經師別傳」以正其失，在阮伯元、江藩之後出者皆在焉。憾此事無可商定，中白（莊棫）、子高（戴望）皆奉戴震為圭臬者，與予異趣，其他更無論矣。⁹⁰

閱《漢學師承記》，鄭堂愛憎之口，何足與於斯文！依傍門戶，遂欲以青浦（王昶）、河間（紀昀）為經師邪？⁹¹

陳氏（恭甫先生之後人）藏書有《漢學商兌》，桐城方東樹撰，與漢學諸君子相難，若東原、茂堂、淵如、鄭堂，誠未足以厭眾志，予閱是書，益以嘆古學之難復，而君子立言，亦無與來者以口實也。⁹²

對清代漢宋之爭稍有了解者多能理解，江藩《漢學師承記》在論述之間，展現出自以為掌握學問之道的優越心理，這種潛藏排他性質的高傲態度，招致學宗程朱者的反擊。在譚獻看來，江藩所錄諸家之學，皆非第一流學問，實不足以厭眾志，然江藩又揚之過甚，以故方東樹（1772-1851）與漢學諸君子相難。他說：「閱方植之（東樹）《書林揚鱗》。……於宋儒揚之恐不升，於經生則抑之恐不沉，矯弊過中。吾則曰，漢學諸公，在山過顛，亦有以召之。」⁹³表示方東樹的反擊，是漢學家激而使之。只是他認為方東樹對漢學的反擊，雖是巨刃摩天，尚非徐夫人匕首，並未能見血封喉⁹⁴，意思是說他選錯了對象，徒然與第二流學問較勁。譚獻由是嘆古學難復，而戒君子立言，無與來者以口實，並且有別立統系的企圖心，想寫一部「國朝經師別傳」，以正江藩之失。此書雖

⁸⁸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18。

⁸⁹ 同前註，《日記》，卷6，頁146。

⁹⁰ 同前註，《補錄》，卷1，頁216。

⁹¹ 同前註，《日記》，卷1，頁7。

⁹² 同前註，頁3。

⁹³ 同前註，卷6，頁130-131。

⁹⁴ 同前註，《續錄》，頁351。

未面世，然譚獻所欲別立者，實不難掌握，就是能以典雅文章闡釋天道人事的大儒，如稍前提到的莊存與、汪中等人。

戴震而外，譚獻對同時期的乾嘉學者，倒是多能平情而論，褒多貶少。如評高郵父子之學言：「夜校《逸周書》四卷，錄王氏《讀書雜誌》也。予素不喜類書，然如王氏之學多由於舊本《北堂書鈔》及《玉海》、《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籍。學士聞見，豈不貴博。」⁹⁵又言：「今之校古籍者，輾轉稗販，往往訛謬。然如高郵王氏《讀書雜誌》，得力多在類書，則又視其人學識如何。」⁹⁶又言：「閱《經義述聞》。〈通說〉一卷是其綱領，實有眼照古人處，雖服、鄭復生，亦當俯首。」⁹⁷譚獻的校書事業，可謂得力於王氏父子為多，對王氏父子的推崇，也溢於言表。又譚獻對錢大昕與王鳴盛之學，亦多所讚譽。如論錢大昕言：

閱《十駕齋養新錄》。……竹汀先生，樸學之桀，辭達而溫。於阮、戴、孔為前輩，邵南江為學子，同時有王西莊、紀曉嵐，雖亦精深銳敏，而粹美無過先生者。戴東原欲以為第二人，竊不謂然。⁹⁸

按譚獻此處所論，亦堪玩味，頗有以錢大昕壓戴東原一頭的意味。戴震的學問，自有其精彩之處，然在戴震生前，不論就政治地位或學術聲望而言，錢皆非戴可比。檢視彼時文獻，常能得此直觀認識。換言之，戴震學術地位超越錢大昕，或者說戴震學的形成，與後繼者之追捧以及數個世代的層累造就，實大有關聯。究心學術史者，於此間敘事之轉換，亦當心有戚戚焉⁹⁹。

再來看錢、王合論。譚獻於錢大昕幾無間言，於王鳴盛則肯定其史學而批評其經學。如言：

閱《十七史商榷》。王氏推崇承祚，予夙論適合。錢氏《廿二史考異》體例尤嚴。論著述，則錢托體高；論啓發，則王為功多。安得假三月之力，

⁹⁵ 同前註，《補錄》，卷1，頁216。

⁹⁶ 同前註，《日記》，卷1，頁15。

⁹⁷ 同前註，頁14。

⁹⁸ 同前註，卷4，頁82。

⁹⁹ 詳細討論，可參丘為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由丘氏所論觀之，戴震雖然於當代學術場域中素享聲譽，然而「戴震學」或者將戴震視為中國十八世紀時的知識論建構者，進而稽考戴氏學術的風尚，尚有待「章（太炎）、梁（啓超）、胡（適）三位啓蒙學者，憑藉著他們在中國知識界的不凡影響力，將十八世紀的知識領袖戴震，轉化成一個近代的文化生產場域」（導論頁6）。

取二書尤要者，錄於諸史簡端，然後推尋其所未及？¹⁰⁰

閱《十七史商榷》畢。向於西莊頗不滿，今檢其考於史之籍，自是學有原本。且以經生而能用力於史，西莊於竹汀為郎伯，足以并美。錢氏徵實，尤不為泛濫之詞，王氏雖不無習氣，然推崇范、陳，譏貶歐、宋，最為卓見矣。¹⁰¹

譚獻認為錢氏《廿二史考異》體例嚴謹，不為泛濫之詞；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以經生而能用力於史，亦是學有本原。論著述，則錢托體高；論啟發，則王為功多，故足以并美。尤其王鳴盛談史學，能推崇范曄、陳壽，譏貶歐陽修、宋祁，最為卓見。以歐、宋文人而修史，未能識源流正變，差謬時有故也。當然，譚獻對王鳴盛還是有不滿的地方，然不在於王氏的史學史識，而是在於王氏的經學。如云：

閱《蛾術編》。西莊大端平實，精力甚強，說經語不若《十七史商榷》，有絕人之識，大要為鄭學所牽繫耳。¹⁰²

按西莊有《尚書後案》，是有名的專宗鄭學之著，其《蛾術編》有關經義之探討，亦一以鄭氏為準¹⁰³。然東漢之學，或以東漢之學為鵠的，如江藩之論，最為譚獻所不喜，或言「去取不饜人意」，或譏「謬論多可笑哂」。原其根本，皆譚獻立足西京為去取之故。所以，即使推崇錢大昕、王鳴盛之學，仍以為非治學之所急。而曰：

予治史，初欲隨筆條記闕失誤字、疑義駁文，然《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既有成編，百一之補苴亦非所急，異日當專為表微之學耳。¹⁰⁴

又說：

欲撰「復堂釋聞錄」，……蓋雜識經疑，或於微言大義有所闕則記之，讀近儒書有所辨證，亦記之。¹⁰⁵

按譚獻念茲在茲的，在於探索經典的微言大義，這是他讀書治學的最高目標。即使研究《說文》，也朝這個方向思考。如言：

¹⁰⁰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7，頁160。

¹⁰¹ 同前註，《補錄》，卷1，頁213。

¹⁰² 同前註，《日記》，卷1，頁9。

¹⁰³ 相關討論，可參張惠貞：〈王鳴盛《蛾術編》之探析〉，《南師語教學報》第2期（2004年7月），頁121-135。

¹⁰⁴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7，頁159。

¹⁰⁵ 同前註，卷1，頁5。

閱《說文解字釋例》、《句讀》卒業，王氏宅心和厚，舉體寬博，可為讀者著書法。以《玉篇》校勘，為予有志未竟之業。許書有段、桂、嚴、王，可謂四大宗。予猶欲以吳西林（穎芳，1702-1781）《理董》之例，總理其微言大義，以為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途徑。¹⁰⁶

按吳穎芳以條例治說文，馬敘倫跋言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為篆書，而細書其說為注；不知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¹⁰⁷又言：「許氏所列間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從某，則所從之某字即可補為正文。」¹⁰⁸譚獻認為依吳氏之法，可以總理《說文》所蘊涵的微言大義，成為由後漢求周秦至西京經學之途徑。言下之意，他認為段玉裁、桂馥（1736-1805）、嚴可均（1762-1843）、王筠（1784-1854）四大宗之學，尚未達《說文》學之極致。

蓋譚獻所懸治學鵠的如此，故國朝漢學之業，實遠未能副其心意，然否定之中仍帶有肯定，不若對宋學之鄙棄。如言：「國朝二百餘年，問學之業絕盛，固陋之習蓋寡。自六書九數，經訓文辭，篆隸之字，開方之圖，推究於漢以後，唐以前者，備矣。」¹⁰⁹按譚獻於宋明之學，頗多輕視，所謂固陋之習者，參諸《日記》，蓋謂宋學。《日記》於宋學所涉不多，然不論經史、性道、文章，常見譚獻諷刺之語。如言：

閱《（新）唐書·儒林傳》。不能詳授受淵原、撰著目錄。宋子京本不通經，又不識前史儒林傳體例，乃至〈陸德明傳〉，未及《經典釋文》，豈非巨謬？〈孔穎達傳〉，不能詳述《正義》所襲六朝諸舊學，然則後世何賴有史哉？¹¹⁰

這是以實齋流略學的眼光批評宋祁《新唐書·儒林傳》的撰著缺失。確實，陸德明為世所知者，在《經典釋文》，而〈陸德明傳〉未能載明；《五經正義》為世詬蔽者，在襲六朝義疏，而〈孔穎達傳〉不能詳述，亦無怪復堂出語尖刻，乃云「歐蕪宋澀，史家之下乘矣」¹¹¹。譚獻又云：

偶檢沈彥子敦《落颿樓稿》，卷二有〈宋神宗用兵西夏論〉，深咎將帥之

¹⁰⁶ 同前註，卷2，頁39。

¹⁰⁷ 馬敘倫：〈跋〉，《說文解字理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204冊，影印上海圖書館藏繆氏藝風堂抄本），總頁188b。

¹⁰⁸ 同前註。

¹⁰⁹ 譚獻：〈篋中詞敘〉，《復堂類集》，《文集》，卷1，頁1461。

¹¹⁰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1，頁12。

¹¹¹ 同前註，《補錄》，卷1，頁215。

不得人。予謂從事西夏者，韓、范皆誤國之臣也，何論其他。趙氏一代，武功最衰，虛辭講學，華辭飾治，文法拘牽，必至於此。豈非百代之龜鑑。¹¹²

如此批判，則是有將有宋一代之衰落，與其學術文章作聯結了。又如言：「閱《何博士備論》。文氣條鬯，讀史亦略見其大。然文士之業耳，何足傳於兵家？有宋之世，文士多好言，蘇氏父子最傳，最無實用。何去非者，蘇氏所賞激，奏進此書，殆不以為空言耶？論司馬仲達之不戰欲以困孔明，不為無見；論孫伯符不當拒董卓，則可謂囁語。」¹¹³此處所言，仍是對有宋一代文士以議論為學術的批判。以下一則，涉及對程朱之學的批評。他說：

閱《春秋正辭》。兼引程伊川、胡康侯之說，或亦詢於芻蕘（採薪之人）之意與？吾故不欲屏趙宋不得為代、程朱不得為人，致為方東樹所訶，故於先生之言非必河漢。往年為徐伯澂校《朱子全集》，予曾更易原書面目，分別部居，究不失為有道君子之言，第畢世未嘗通經，其咎固甚於程也。程氏於《春秋》、於《易》亦有窺見大誼處，得不償失則有之，必謂一無所知，非公言矣。此尤非子高所樂聞。子高治《論語》，推究大義，吾惟服之。朱氏於《論語》巨謬以數百計，垂之國冑，貽患無窮，亟宜有以救正之也。¹¹⁴

譚獻因為推尊莊存與之故，所以對《春秋正辭》兼引程頤、胡安國之說，委婉表達肯定。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謂詢於芻蕘，所謂不欲屏趙宋不得為代、程朱不得為人，致為方東樹所訶者，則是對有宋一代、有宋之學最大的輕視。更何況譚獻接著又諷朱子畢世不通經，其咎甚於程子。程子《春秋》、《易傳》尚有可採，然朱子《論語》巨謬以數百計，以教國子，後患無窮。如此激切言論，亦難怪譚獻在整理《日記》時，屏之不收。但這又何嘗不是譚獻心中最真實的想法？再觀一則《日記》所載：

沈谷成將重刻日本物茂卿《海外新書》，寄予讀定。錢泳初刻稱名不雅，予欲改《物氏遺書》。是編辨道為綱，辨名竟同自注，不獨欲短程、朱，直已譏彈思、孟。大旨以孔子不制作，為非聖人；孟子道性善，不如告子杞柳為柷椽之說。大本偏激至此。而所稱幸讀王、李之書，殆指東國先

¹¹² 同前註，《日記》，卷6，頁144。

¹¹³ 同前註，卷4，頁97。

¹¹⁴ 同前註，《補錄》，卷1，頁214。

哲，非陽明、中孚也。……閱竟，擬書後以詒谷成。非亡端與海外人空言送難，惟以宋代儒術固流弊滋多，針砭者不中鄙穴，則變本而加厲，承學者不可不別白也。¹¹⁵

狄生徂徠（物茂卿，1666-1728）的《論語徵》（即所謂的《海外新書》），可以說是太平天國亂後，重建中原文化的重要資源，在義理價值觀上，是書多遠引孔、孟與程為異¹¹⁶。譚獻在閱畢物茂卿之書後，有感其人欲短程朱，乃至譏彈思、孟的偏激議論，由是而慨嘆宋代儒術雖流弊滋多，針砭者若不中鄙穴，則變本而加厲。

再來看另一則日記，譚獻云：

閱《左海文集》……編修於文事功力不深，又誤於華縛，於經生詞章二家均無當。駢文亦無氣骨，未可與孫、洪同年而語。詩平正，適成閩派。三日翻閱編修書殆遍，留心漢學，亦有志之士，而家法不正。其為康成車後垢囊，失尚小，乃至染指晦庵，下逮李光地，依阿同流，豈為豪傑！¹¹⁷

譚獻分別從文章、經術批評陳壽祺之學，以為於經生詞章二家均無當。駢文既無骨氣，經學則家法不正。然不正之失，亦分大小。若留心漢學，為康成車後垢囊，其失尚小；至於染指晦庵，下逮李光地（1642-1718），依阿同流，豈能為豪傑！蓋譚獻對有清一代閩省學術最為輕視，嘗言「閩中學術為李氏兄弟敗壞不可挽救」¹¹⁸，指的正是李光地。錢穆先生嘗言：「繼晚村（呂留良，1629-1683）之後而言程、朱宋學者，上之為陸稼書（1630-1692），下之為李光地。稼書已不能過吳、許，至於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¹¹⁹則是以李光地無法學繼程、朱。譚獻既輕朱子，則於等而下之的李光地，又何能有好言語。是知其心中正學，既非程朱，亦非漢學，而在常州莊氏所揭西京之學矣。

¹¹⁵ 同前註，《日記》，卷8，頁192-193。

¹¹⁶ 楊際開：〈清末變法中的日本因素〉，《二十一世紀》總第109期（2008年10月），頁56。

¹¹⁷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12。

¹¹⁸ 同前註，頁211。

¹¹⁹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頁87。

四、譚獻對常州經學的評價

在討論譚獻對常州學術的評價時，先要理解的是，對其間經說優劣的品評，首先是從文章發揮經義的角度，而不是立足於典據考實的角度，所以在評論之間，每與痛詆常州之學的考據家異趣。無疑譚獻在評論之間，蘊藏太多個人情感於其中，而有不客觀之病。然而從另一方面看，譚獻的評論，也可以說是學術優劣的另一套檢視系統，其故在於可藉由其異乎主流的觀點，作為思考經學史乃至思想學術史上的種種學術偏見；更重要的意義當在於能從方法學的層次上，針對此一以考據定優劣的學術價值觀進行反思。換言之，跨越考據視野，藉由文人之口，既可以看出對清代學術的另一面評價，也可以對吾人之治經帶來方法學上的反省。所以，姑不論譚獻所論是否得實，至少已為我們觀察學術歷史以及治經途徑多開了一道窗口。雖然在理論或立場上，當代已漸有學者能超越考據視野，建構新的學術觀，但是堅強而實質的論述尚待廣泛的建立。如此，則追索不同於考據學價值立場的前輩之言，也是拓展學術史視野的大關鍵。從這樣的一個學術大背景來看譚獻的學術評論，就有其深刻的意義在焉。更何況，與專就《公羊》傳衍來發揮的晚清今文學論述相比，譚獻對常州學派經說的全面性評論，更可以為我們理解常州經學的本質與面目帶來直觀上的認識，並進一步反省我們理解的經學性質，究竟有何侷限之處。更重要的是，譚獻對常州之學的討論，乃在乾嘉語境下進行，而非一般人熟知的晚清視域。換言之，譚獻筆下的常州學派面目，與我們習以為常的晚清今文學歷史敘事之間，存在著多大的距離，這又是治經學史與學術史所當知者。

按宗經徵聖的傳統，在科舉時代透過經義時文的表現形式，使得文學家與經學家兼於一身，是唐宋以下的普遍情況。所以在考據學方法興盛以前，追述大臣援經立義，出以策論奏議的「經術文章」，是傳統士人表現學問的基本觀念，「文章」便於科舉發揮，「經術」則由文章表現，二者互為體用，既利於科舉，亦便於闡釋經義。此種經學表現形式所重者在於經典義涵之發揮，而非在於文本歷史文獻之還原。所以是文章與經義並重，而不是考據與訓詁為先。但是這樣的治經模式，自乾嘉以來，已是從被鄙棄到被漠視，很難做為理解歷史上與現實中經學面目的依據，而有待於從許多被忽略的片斷中，釐析出「經術文章」曾經擁有的風華歲月。可貴的是，從對常州學派經說的觀察中，可以補

足這方面的缺憾。

學術路徑近於考據的李慈銘，在評論《味經齋遺書》時，為我們留下了線索。他說：「侍郎（莊存與）雖不足為醇儒，而無媿于通人，經制之學，亦昭代名家矣。」¹²⁰又說：「侍郎專於《春秋》公羊學，其說經惟主知人論世，而不為名物訓詁之功，故經學雖無家法，而文辭奧衍，自成一子。」¹²¹稱莊存與經制之學為昭代名家，指的既是他的廟堂應制之文，也可以說是經筵講章，這種功能性明顯的「經術文章」，如同李慈銘所言，是「惟主知人論世，而不為名物訓詁之功」，所以沒有考據學者強調的漢學家法，卻是文辭奧衍，自成風範。另外，臧庸之學，每為漢學家如阮元等人所推挹，其論存與《尚書既見》，則曰：「讀公《尚書既見》，歎其精通浩博，深于大義，章句小儒，未由問津矣。」¹²²而譚獻則云：「閱莊宗伯《味經齋遺書》，閱深博大，卒不能得其涯涘，識大之賢，又高出諸經師上矣。」¹²³又柯劭忞（1850-1933）說存與所論：「皆義蘊宏深，章句小儒，不足以望其項背。」¹²⁴不難明白，所謂「深於大義」、「閱深博大」、「義蘊宏深」，指的是廟堂大臣透過文章，對經學義理作深層次的發揮，而所謂「醇儒」、「經師」或「章句小儒」，指的是列入儒林傳的經生之業。蓋經生之業，主於文字詁訓，名物考據；經制之學，或發揮於策論，或經筵之講章，此存與所謂「經術文章」也¹²⁵。今觀譚獻論存與之《易》曰：

《易說》深美閎約，如加玉心焉，可以當浩乎沛然矣。……《繫辭傳論》

¹²⁰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頁 1169「味經齋遺書」條。

¹²¹ 同前註，頁 1168「味經齋遺書」條。

¹²² [清]臧庸：〈禮部侍郎莊公小傳〉，《拜經文集》（清同治九年上元宗氏據漢陽葉氏舊藏本），卷 5，頁 2b。

¹²³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 2，頁 44。

¹²⁴ 參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上冊，頁 56b。

¹²⁵ 按：存與〈朱中憲墓表〉云：「編修公以經術文章，衣被一世，而公則承以惇德至行，為政於家，是學問之本也。」（見章學誠：〈訂正莊方耕侍郎所撰朱中憲墓表〉，收入《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頁 158b。）「經術文章」，即廟堂應制之文。如龔自珍〈崑山徐尚書代言集序〉云：「謹讀二公（乾學、元文）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厥遇，而尚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尚書代詔制之文，舜聲堯容，義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懿告乎萬代。」（〔清〕龔自珍著，夏田藍編：《龔定庵全集類編》〔北京：中國書店，1991 年〕，頁 4。）此處所云「舜聲堯容，義情軒思」，即廟堂學者經術文章發用之處也，觀察存與，實當以此。

依經立誼，旁推交通，致用之學，非經生之業，是正群言，所當者自廢。《象傳論》斗亂不亂，有物有序，而言外之旨尤廣。《象象論》大義微言，同條共貫，而於用人之消長，宮府之舉措，武事之張弛，仁義之本末，重言申明，若重有憂者，古大臣之陳謨，豈徒儒者之著書也哉。先生之說《易》也，蓋深於《禮》、《春秋》，故典常之小大，密於康成；天人之本原，究於江都，兩漢鉅儒，殆以兼美。¹²⁶

按譚獻「古大臣之陳謨，豈徒儒者之著書」的贊語，可謂道盡文人糾結於經典與政治之隱衷。這是通經致用傳統下的文人治經，而非以學問為務的經生之業。所以，講究的是以深美闕約之文，發其言外之旨，然後依經立誼，旁推交通。其中大義微言，若有憂者，在於執道論政，陳謨規諫。又以深於《禮》、《春秋》之故，其論《易》乃不同宋儒性道之語，而是寓於典章以論天人之際，乃譚氏所謂「以經義治事為歸」者¹²⁷。故「於用人之消長，宮府之舉措，武事之張弛，仁義之本末，重言申明」，是知其功能與目的，與經生章句，如日月之懸隔，有體用之殊致。故譚獻贊之曰：「密於康成，……究於江都，兩漢鉅儒，殆以兼美。」再舉譚氏所評《尚書》、《毛詩》、《四書》為例。譚獻云：

《尚書說》、《毛詩說》渾粹有道之言，經師而人師矣。¹²⁸

《毛詩說》推見至要，抉經之心，古人如面語也。《楚茨集釋》推尋禮經，定為天子大祀，亡一字泛設，《集傳》公卿有田祿之言小矣。¹²⁹

讀莊侍郎《四書說》一卷，精實處且勝《孟子字義疏證》也。¹³⁰

按譚獻「渾粹有道之言，經師而人師」之評，既點出了存與《尚書說》、《毛詩說》的義理性大於知識性的特質，也是對存與經說保有儒者醇正龐大氣象的贊許；而「推見至要，抉經之心」的評論，則是對莊存與能對經典作深層次發揮的正面肯定。對於《四書說》及《楚茨集釋》的推崇，則含蓄的表示出存與的經學見解既高於戴震，也不遜於朱子。譚獻另一則對《尚書說》的評價，也可以提供讀者更多的思考空間，他說：

¹²⁶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7，頁161-162。

¹²⁷ 同前註，卷1，頁6。

¹²⁸ 同前註，頁21。

¹²⁹ 同前註，卷7，頁161。

¹³⁰ 同前註，《補錄》，卷1，頁254。

仍閱方耕先生《尚書說》，似是未竟之緒，亦由依違偽古文，究有其不可通者在。然龔禮部為〈莊侍郎墓表〉，言先生有不得已之苦心，故其言〈舜典〉，一則歸「慎徽五典」以下於〈堯典〉，而舉《孟子》所引諸文為〈舜典〉，則所以示來學，表古誼者，在此不在彼，是在後人心知其意耳。¹³¹

莊存與是乾嘉時期對偽古文《尚書》維護最力的學者，他感慨於漢、唐以來，聖教衰微，獨賴有《五經》在，猶得依弱扶微，匡翊人主，默持世道，若是如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般攻訐過甚，將啟後人變亂古經之漸，《五經》將由此糜爛，於是屏不敢加以辨駁，而且認為古文多精理粹言，故「說經之作，亦多徵引古文，欲以彌縫經傳，尊保彝訓，心至苦矣」¹³²。這樣的立場，顯然不被樸學之士所認同，乃率以臆說視之，認為是附會糾纏，浮辭妨要，是乾隆間諸儒經說，斯最下矣¹³³。然文章之士雖知其彌縫今古文有必不可通之處，卻仍能深體存與撰述用心之所在，而給予理解之同情。按莊氏說〈舜典〉，不從偽古文別〈舜典〉於〈堯典〉之說，而是根據《孟子》所引有關舜的文字記載立論，以為乃真正的〈舜典〉佚文，然後極力描繪虞舜大聖的正面形象，尤其側重舜與象之間，兄弟相處之道的梳理，故所言「皆論舜事父母之道，以孟子之言為本而證明逸《書》之〈舜典〉……」¹³⁴。相對於考據學方法而言，這種「依經立誼，旁推交通」的義理闡釋，又是另一種治經的典範，此即譚獻所言「示來學、表古誼」的在此不在彼之意。兩相比較，一者是出以獨斷論立場的排他性語言，一者則尊重作者著述之用心及其詮釋之模式。後者的態度，不正是吾人治經，所應細心領會者？所以復堂先生留給今日治經者的寶貴資糧，不止在於理解過去，還有在於認識當下。

至於存與《春秋》之學，譚獻更是不吝其言的贊美。如言：「閱莊先生《春秋正辭》，此絕業也。兼采程伊川、胡康侯，或者《尚書既見》之意乎！博大深至，條舉件繫，卓乎屬辭比事之教。」¹³⁵如上節所言，對於宋儒之學，譚獻頗為輕視，卻能對莊氏兼采宋儒之說曲為開解，委婉表示肯定。其實，莊

¹³¹ 同前註，《日記》，卷1，頁3。

¹³² 〔清〕莊綬甲：〈尚書既見跋〉，《拾遺補藝齋文鈔》（道光十八年李兆洛刊本），頁34b。

¹³³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冊，頁109、下冊，頁1167。

¹³⁴ 莊綬甲：〈尚書既見跋〉，頁35a。

¹³⁵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1，頁3。

氏與宋儒牽扯不清的關係，已為皮錫瑞、江瀚所揭¹³⁶，以譚獻精熟於莊氏之學，不可能無所見，卻是能從正面論其用意，表示即使採薪人（程頤、胡安國）之意見，亦有補於經義。當然，莊氏的《公羊》學立場，更不會被譚獻所遺忘。今觀其言曰：

讀先生書，而《左氏》不傳《春秋》之義益明。即《公羊》之偏至，如衛輒父子之論，何嘗不講去其非以求其是乎？墨守者可以悟矣。¹³⁷

按衛輒拒父是春秋時代著名典故，衛國太子蒯聵因違抗衛靈公之命出逃國外，後其子衛輒繼位，拒不接納父親衛蒯聵回國。《公羊》以為孝子，提出的理由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許拒其父。《左傳》以為「子而拒父，悖禮逆倫，大惡也」。《穀梁傳》同意《左傳》的見解，故范寧之序謂「以拒父為尊祖，是子可得而叛也」。攻防之間，在於王事公義與家事私恩之間的輕重問題¹³⁸。莊存與雖重《公羊》，然在具體事例上亦不輕從。他先從子無去父之義來評斷蒯聵之出奔，又以《春秋》書蒯聵之奔乃書法之特例，用以說明父子之變極矣。故《春秋》志蒯聵出奔，是「聖人之誅蒯聵也，且正輒之不宜立也」；又《春秋》志衛輒圍戚（蒯聵入衛所居之地），是「聖人之誅輒也，且正蒯聵之不釋罪也」¹³⁹。則是不與《三傳》同調，乃譏蒯聵父不父而輒子不子矣。

需要說明的是，莊氏以深沉之思，旁推交通，發為奧衍之辭，乃文人說經之極致，理當有其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但即使時至今日，我們對於這方面的認識，其實仍大有不足。先來看張惠言弟子董士錫的敘述，董氏由文章論存與之學，而謂：

其為文，辯而精，醇而肆，旨遠而義近，舉大而不遺小，能言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巨滙也。¹⁴⁰

董士錫經學別流巨滙之說，需視學者立足於何種經學立場而定，這裏牽涉到學術史認知的複雜糾結，此處不擬深談。但是，以文章發揮經義，或者經學義理

¹³⁶ 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卷1，頁104；江瀚：〈書序述聞提要〉、〈尚書今古文集解提要〉，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上冊，頁241a-b。

¹³⁷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7，頁162。

¹³⁸ 相關討論，可參林義正：《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3年），頁100。

¹³⁹ 〔清〕莊存與：《春秋正辭》（光緒八年陽湖莊氏藏板），卷10，頁27a-28b。

¹⁴⁰ 〔清〕董士錫：〈易說序〉，《味經齋遺書》（光緒八年陽湖莊氏藏板），卷首，頁3b。

需由文章展現的論學立場，在經學場域應該得到的話語權利，顯然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從這個角度來看，譚獻對莊氏經說的推許，還有一層以文章論學術優劣的用意在內，而與源流深遠的文論傳統有內在的聯繫。今觀其言曰：

《尚書既見》精深而有遠思，唐賢學漢文似未到此。……《四書說》盧牟六籍，貫串四科，不當以箋釋求之。章法完密，起伏有神，可入經師文抄，授學子讀。¹⁴¹

按莊綬甲言《尚書既見》三卷，皆所以明聖人之於天道¹⁴²，故譚氏評之以為精深而有遠思，又言唐賢學漢文似未到此者，則是以存與文章直接漢人矣。又《四書說》則廣徵兩漢載籍，專與朱子為異¹⁴³。文悍而肆，說理綿密。故譚獻以為章法完密，起伏有神，有別於箋釋，可入經師文鈔，為學子課業之範本。在譚獻心目中，治經並非樸學之士的專利，發揮經義的文章之儒，同樣可擠於第一流之位。他說：

閱莊方耕先生《尚書既見》，雖未決去偽古文，而文事深醇古厚，直接荀、董，猶子葆琛先生無此淵懿也。國朝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莊氏一家，皆第一流。¹⁴⁴

按譚獻曾言：「讀董子，大賢亞聖，吐辭為經，豈徒師儒之望。」¹⁴⁵又言：「董子為《春秋》第一師，故雜論政道，皆推本聖緒，醇備可見施行，至於陰陽五行，大義微言，洞達天人之故，固當鼎足孟、荀，覺賈生尚多粗粗。」¹⁴⁶譚獻謂董生可鼎足孟、荀，而以存與文事深醇古厚，直接荀、董，則是不與並世儒者比肩矣。此蓋以身兼孟、荀傳道，董、賈文章視存與，可謂對儒者傳經最高之禮贊，至於辨古籍真偽，乃「為術淺且近者也」¹⁴⁷，此經生事業，非通儒所應為。然胡玉縉（1859-1940）乃謂：「譚獻《復堂日記》乃以（莊存與）為國朝第一流，謂『雖未決去偽古文，而文字深醇古厚，直接荀、董』。譚氏固不

¹⁴¹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7，頁161-162。

¹⁴² 莊綬甲：〈尚書既見跋〉，頁34a-35b。

¹⁴³ 蔣彤：〈四書說跋〉，收入莊存與：《四書說》，卷末；又倫明：〈四書說提要〉，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上冊，頁961a。

¹⁴⁴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1，頁3。

¹⁴⁵ 同前註，頁6。

¹⁴⁶ 同前註，頁14。

¹⁴⁷ 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42。

知經學者，故僅論其文章也。」¹⁴⁸胡氏所言經學，仍不脫考據問架，故有是論。其間不必真有是非，端在學者如何認定經學耳。再來看一則譚獻的評論：

夜誦《珍藝宦文（鈔）》，琅琅真作金石聲，說《書》、《詩》數篇，風發泉湧，而淵淵翼翼，潛氣內轉，賈、董之倫，去人不遠。不欲為一先生之言，故於相承師說微有異同，此與宗伯方耕先生大略相近，莊氏家學之所以為大也。¹⁴⁹

這是譚獻對莊述祖文章的評論。所謂「風發泉湧」、「琅琅真作金石聲」者，當不止是推許述祖能用金文古籀論《書》、《詩》而已，而是真能從其論《書》、《詩》的篇章中，體悟出文章之妙與識見之高。而「淵淵翼翼，潛氣內轉」者，既是嘉許其文章在飄逸靈動之中，潛藏內斂的才氣，更是以駢文技巧的最高禮贊來形容之。更何況其經說能自有見解，不為相承師說做註腳。是莊氏家學所以為大者，即在於文章能入賈、董之倫，其學能有獨見之明的緣故。所以，在譚獻心目中，惠氏、王氏、莊氏三家雖然同屬於第一流，不過三者之間，仍有高下之分。其云：

閱劉申受（逢祿，1776-1829）《書序述聞》，說《尚書》精深，源於宗伯公（莊存與）。吾故謂莊氏家學精於惠，大於王矣。¹⁵⁰

譚獻對此精於惠，大於王的莊氏家學，可謂衷心讚美，由稍前所引，已可推知。再來看幾則譚獻的評論：

《珍藝宦遺書》，夏時之學，冠絕古今，莊氏家學，皆由《春秋》而推，董、胡母之遺緒，於是大昌。¹⁵¹

閱劉申受先生說《公羊》諸書，如寒得裘，如客得歸，耳目神志皆適，小小異同，可微辨也。¹⁵²

宋于庭先生《論語說誼》。《公羊》專門之學，由大義以通微言。《論語》二十篇，子夏等撰，集先聖微言，大校明《春秋》之旨，標性道之教，推變文從質之志。知所損益，則明堂定〈玉制〉，《春秋》合天

¹⁴⁸ 胡玉緝：〈許廣經籍題跋經部之一·尚書既見書後〉，收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四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27。

¹⁴⁹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1，頁7-8。

¹⁵⁰ 同前註，頁4。

¹⁵¹ 同前註，卷7，頁158。

¹⁵² 同前註，卷2，頁41。又譚獻《復堂詞話》言逢祿「經學淵源泉文、方耕兩大師，《易》、《書》、《公羊》，可云卓爾」（頁50）。

運，皆具於此。百家之弁冕，《六藝》之總龜。旁推交通而亡餘蘊，偉矣哉。¹⁵³

雖然譚獻對莊氏家學的評論，大多扼要簡短，幾筆帶過。然在提綱挈領之間，還是可以品味出他對莊氏家族濃重的敬意，並且已由對文章的寶貴衍伸為對經說的推崇，以上所舉，即為顯例。所以，除了莊存與之外，譚獻於莊述祖、莊綬甲、劉逢祿、宋翔鳳之學，多有論述，亦每多稱許之言，而致憾於樸學細碎之業。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譚獻對莊述祖《尚書》的介紹。乾嘉時代《尚書》學蓬勃興盛，學者每舉江聲、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為代表，而罕見對莊述祖《尚書》學的討論。在晚清，除了定海黃氏父子略加徵引之外，就是皮錫瑞在《經學通論》裏的痛加批判，以為襲宋人餘唾。但是，在譚獻的眼裏，莊述祖的《尚書》學卻是有清一代之最，所以於莊氏《尚書》，就論之特別詳盡。尤其能以流略學眼光，將述祖的《尚書》學置於有清一代《尚書》學的發展變化中來討論。《日記》中有一較長之片段，將莊氏《尚書》學與惠、戴《尚書》學作一比較。譚氏於莊氏說《尚書》時有與《偽孔傳》同者，引焦理堂「書傳雖偽，亦是魏晉間經師二十八篇訓詁章句」之說為之開解，而後點評當代如惠氏、王氏、江氏、孫氏、段氏之《尚書》學，或以為語焉不詳，或止為編校之事，甚至有紕謬百出者。其言曰：

《尚書》之學沉霾千載，閻氏葦路籃縷之功不無小疵，其書又曼衍，非說經家法。惠氏亦語焉不詳。王西莊《後案》方有成書，病在過拘鄭義，而兼采晉傳，未可厚非。江艮庭失在雜用載籍，徵引改竄經文，疑誤來學。注疏闕博，不愧通儒。至於〈禹貢〉、〈洪範〉之篇，尤為卓爾。孫星衍《尚書馬鄭注》是編校之事，略可傳信，繼刻《今古文注疏》，則紕謬百出，乃至有意與偽《孔》立異，不惜下同蔡沉，寧不令人齒冷？段茂堂《古文尚書撰異》詳於文字，略於義訓，不輕改，不為臆說，能使人思而自得之。但得達人斟酌什一，則壁經文字可以垂之國冑矣。¹⁵⁴

譚獻在點評各家《尚書》學的優劣與侷限之後，不無感慨的說：「至於微言大義、名物典章，不能無待。」按莊述祖在〈答孫季述觀察第二書〉中言：「《尚

¹⁵³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7，頁157。

¹⁵⁴ 同前註，《補錄》，卷1，頁209。

書》疏通知遠之教，三代帝王大經大法畧具，竊不自量，欲采集西漢以前諸儒傳記為一書，以畱微言大義於萬分一。」¹⁵⁵述祖在此信中，透露出莊氏家學賦予《尚書》三代帝王大經大法的意義，及家族論學主西漢以前以探聖王微言大義的傾向。合以譚獻對莊存與《尚書》學的禮贊觀之，我們是否有充分理由，認為莊述祖所治《尚書》之業，正是譚獻所期待的呢？

尤其莊述祖除了討論《尚書》本文之外，也將《逸周書》納入其《尚書》學體系之中，作為論證家族所揭聖人之於天道的依據。這一部分，可以說是莊述祖《尚書》學最精彩之處，而譚獻也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在《日記》裏留下不少這方面的記載。他說：

《讀書雜誌》校〈大武篇〉補脫最為有功，只是細考舊類書耳。葆琛先生有校《周書》全本，瑰瑋絕特，當什伯王氏，憾未得見。見《尚書記》中，〈商誓〉、〈度邑〉、〈皇門〉、〈祭公〉、〈芮良夫〉、〈嘗麥〉諸篇，時時以古文大小篆讀定，初則驚怖其言，已而如古人面語，豈非千古之奇文？說稍繁，未能裁入《周書》簡端，且專門名家之學，不得雜入校讎中。予推莊先生過於賈、馬、服、鄭，俗耳聞之，不得不駭詫。¹⁵⁶

這是將王念孫與莊述祖對《逸周書》的研究作一比較，指出兩者有層次上的差別。王氏之考訂，只是細考舊類書而已；莊述祖卻是以古文大小篆讀定《逸周書》，使其文從字順，如古人面語，故譚獻嘆為千古之奇文。所以他推服莊述祖過於賈、馬、服、鄭，卻又感慨無深識之人。

按莊述祖《歷代載籍足徵錄》有「《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一條，其下有一長按語，大致以為《逸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其中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又有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實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也。故校讀《周書》七十一篇，重為排比，分為三類：其中，「《周書》周史記」為《尚書》家言；「周史六弢」則儒家言也；「《周書》陰符。」則道家言也。莊述祖認為《尚書》家之周史記，唯〈商誓〉、〈度邑〉、〈皇門〉、〈嘗麥〉、〈祭公〉、〈芮良夫〉六篇，為周大史所載，謹以隸古校定為逸《書》¹⁵⁷。今所見惟此《尚書》家言之數篇及〈世俘〉而已。譚獻云：

莊述祖先生《尚書記》，遺書未刻，宋于庭刻之《浮谿精舍叢書》中，校

¹⁵⁵ 莊述祖：《珍藝宦文鈔》（清道光間莊氏脊令舫刊本），卷6，頁3b。

¹⁵⁶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1，頁7。

¹⁵⁷ 莊述祖：《歷代載籍足徵錄》（清道光間莊氏脊令舫刊本），頁6b-9a。

定〈湯征〉、〈商誓〉、〈武成〉，足爲定本，可垂國冑。〈度邑〉、〈祭公〉、〈芮良夫〉諸篇，於《周志》（《左氏春秋》稱《周志》）可云精審，以附逸《書》，未足以厭後世之志。¹⁵⁸

按譚獻所云《尚書記》篇目雖與莊述祖所言略有出入，無妨於譚獻對莊氏《尚書》學的推崇，尤其以爲不當將此數篇放在逸《書》之列，最爲有見。今觀宋翔鳳（1779-1860）〈尚書記跋〉曰：

葆琛先生於《尚書》學，推本《書序》，錯綜論定，如見遠古，曾采《逸周書》、《太史公》爲《尚書記》，申以己說，蓋非近代考據家所能及也。先生嘗以古籀、大篆讀正《逸周書》，具有成編。迨捐賓客，翔鳳方官泰州，未能聞枕藉之言，後婁問諸外弟，則出《尚書記》，爲先生次子又朔稚莫手錄。茲距先生之沒已卅七年，稚莫之沒亦將卅年。敬梓此書，以惠來學。他日如得所校《周書》全本以行，則所深冀矣。時咸豐三年正月廿二日，外甥長洲宋翔鳳謹記。¹⁵⁹

述祖所校《逸周書》之全本，今所未見¹⁶⁰。似乎莊氏生前也並未逐錄其校本之全文，故翔鳳所見，僅《尚書記》所校七篇而已。然即使知道有《尚書記》的人，可能也不多，或學術門徑不同，亦不以載入。如朱右曾的《周書集訓校釋》，並未採述祖之說，這一點頗招譚獻的不滿。如言：

跋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云：陽湖莊述祖先生以古文讀定《周書》，全本不傳，傳者〈祭公〉以下七篇，以〈世俘〉附。宋于庭刻入《浮谿精舍叢書》。曰《尚書說》，蓋以爲孔氏百篇之遺。今朱氏纂集盧、王、丁、洪諸家校釋，而不及莊，豈未及見歟？抑所學固殊也？¹⁶¹

又言：

¹⁵⁸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1，頁3-4。

¹⁵⁹ [清]宋翔鳳：〈尚書記跋〉，收入莊述祖：《尚書記》（光緒中江陰繆氏刊本《雲自在龕叢書》，第1集），卷首，頁1a-b。按：述祖《珍藝宦文鈔》卷二，載〈讀湯誥〉、〈讀商誓〉、〈讀度邑〉、〈讀皇門〉、〈讀祭公〉、〈讀芮良夫〉、〈讀嘗麥〉等文七篇，即宋翔鳳所謂之《尚書記》。觀翔鳳所言，知翔鳳曾刊行述祖之《尚書記》於《浮谿精舍叢書》中，譚獻所記亦同。然《尚書記》，今收於光緒間江陰繆氏刊《雲自在龕叢書》中，而非宋氏《浮谿精舍叢書》，或傳世有別本《浮谿精舍叢書》內載《尚書記》？質之以就正於方家。

¹⁶⁰ 按：黃懷信等人所撰寫之《逸周書彙校集注》，彙萃古今眾家，其中引述祖關於《逸周書》之作，亦僅列《雲自在龕叢書》本的《尚書記》而已，未見述祖所校《逸周書》全本。

¹⁶¹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卷5，頁123。

閱朱又曾《周書集訓校釋》十一卷。經師論定為百篇之遺，非出汲縣冢中。朱氏後出，頗采戴、王粹語，丁宗洛《管箋》亦掇拾入注，惜其未見莊氏說耳。予有趙在翰校本，明年當並莊氏《尚書記》補拾遺闕，庶幾可讀。¹⁶²

譚獻認為朱右曾未將述祖之說錄入，是有學術偏見。筆者以為，除了《尚書今古文考證》、《書序說義》之外，述祖尤有功於《尚書》學者，在其《尚書記》校定〈度邑〉等七篇為逸《書》。若將述祖之說與現代學者之說相互參證，即可見述祖論斷之精確。李學勤在〈逸周書彙校集注序言〉一文中云：

《逸周書》各篇不出一手，年代不同。朱右曾以為：「〈克殷〉篇所敘，非親見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門〉、〈芮良夫〉諸篇，大似今文《尚書》，非偽古文所能彷彿。」郭沫若先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主張「《逸周書》中可信為周初文字的僅有三二篇，〈世俘解〉即其一，最為可信。〈克殷解〉及〈商誓解〉次之。」現在看來，〈世俘〉、〈商誓〉、〈皇門〉、〈嘗麥〉、〈祭公〉、〈芮良夫〉等篇，均可信為西周作品。¹⁶³

述祖所校定七篇之中，〈湯誥〉不載於《逸周書》之內，乃述祖從《史記》、《論語》、《墨子》、《呂氏春秋》摘其遺文佚句，理董而成者。其餘論定〈商誓〉、〈度邑〉、〈皇門〉、〈祭公〉、〈芮良夫〉、〈嘗麥〉，加上〈世俘〉一篇，今日皆可證其為西周作品¹⁶⁴。近日出土的清華簡中，亦不乏〈世俘〉、〈皇門〉、〈嘗麥〉、〈祭公〉等已被證明為西周作品的篇章。其論斷之精有如此，亦難怪

¹⁶² 同前註，卷4，頁86。

¹⁶³ 李學勤：〈逸周書彙校集注序言〉，收入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冊，序言頁2。

¹⁶⁴ 按：《叢書集成續編》收有述祖《尚書記校逸·世俘》一篇；其《珍藝宦文鈔》則有〈書校定逸周書世俘後〉，二篇內容不同。又：屈萬里先生認為：「《周書》的〈克殷〉、〈世俘〉兩篇，同是記載周武王伐紂的史事的；〈世俘篇〉的記載，更為詳悉。〈世俘篇〉記事很質直，文章也樸實無華；它所用習語，又常和《尚書》的〈周誥〉相似，從這些方面看來，它似乎是西周時代的作品。它和《尚書》的〈武成篇〉是同一記事，而內容則頗有殊異。」屈萬里先生亦提到顧頡剛先生在所作的〈《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裏，認定《逸周書》的〈世俘篇〉就是《尚書》的〈武成篇〉。顧氏認為〈世俘篇〉的著成時代，當在西周。而且，從行文語氣來看，顧氏似乎認為此篇著成時代在西周初年，顧氏並且列舉五點理由以證成其說。屈萬里先生並列舉四項證舉以補充顧氏之說，並認為「〈世俘篇〉是西周時代的產物，似無可疑。」不過屈先生並不贊成顧氏所言《逸周書》的〈世俘篇〉就是《尚書》的〈武成篇〉。其詳請參屈萬里：〈讀周書世俘篇〉，《書僞論學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0年），頁412-432。

晚清孫詒讓、劉師培研究《逸周書》，每以述祖之校改為得其實¹⁶⁵，然譚獻已著其先鞭矣。

五、結論

復堂《日記》雖篇幅簡省，然內容豐富多元。或論經史，或譚文藝，上下過兩千載，筆涉儒林文苑。由於《日記》的寫作、整理、出版有一個較長而曲折的過程，所以既有譚獻生前親手刪定者，亦有身後戚友整理補錄者，雖然「兩者比勘，往往悟入，大有意趣」¹⁶⁶，然其區別主要在評騭人物的語氣與態度上，而非學術見解有本質性的差異，所以基本上都可以作為研究譚獻思想學術的珍貴材料。本文所論，雖不及十一，亦可以觀譚獻文儒之志。以為譚獻雖終老布衣，然興趣所至，意在廟堂，高視經生。故於常州莊氏經術文章，最為嘆服，乃於漢學考據之業，雖能為而意不喜，此文章之儒命世之意，亦所以寄託其不得志也。至於宋儒之學，或以身處大環境的學術慣性之故，屢致其鄙薄之意。《日記》所褒所貶，不出乎此。李慈銘批譚獻，云：「質敏好學，近人中極難得，而心粗氣浮，不能研討，自剽襲陽湖莊氏、武進劉氏、邵陽魏氏一二之書，及其鄉邵位西緒論，遂以大言自欺欺人。」¹⁶⁷而譚獻批俞樾，云：「說經紕繆，偶及小學，間可取其慧思。小言破道，私智盜名，謬種流傳。經生有

¹⁶⁵ 其詳請參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

¹⁶⁶ 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後記〉，頁 418。按：《復堂日記》前六卷起自同治二年癸亥（1863），迄光緒十二年丙戌（1886）五月。最初刊載在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出版的作者自編文集《復堂類集》裏，由馬賡良作序；後又稍事修飾，增補兩卷。今觀其卷七開頭曾言錢塘羅矩臣贈還同治元年壬戌（1862）閏八月至（同治二年）癸亥三月（1863）《日記》手稿，然校之以卷七、卷八內容，僅起始數則而已，其餘已刪汰。日記時間主要從光緒十二年起，至十七年辛卯（1891）止。此卷七、卷八所錄，即譚氏所言「續錄」之內容。八卷本《日記》為譚氏手定，每則皆不繫月日，惟知作於何年。又另有《續錄》一卷，則譚氏光緒十八年正月以後日記。每則皆附以月日，絕筆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七日。此一卷之《續錄》與譚氏所言「續錄」，名同實異。又《補錄》二卷，則譚獻次子妻舅徐彥寬就收存八卷本刪汰之原稿，整理而成，時間從同治元年閏八月至光緒十七年十二月止。徐氏合《補錄》二卷、《續錄》一卷，入《念劬廬叢刻》，倩錢基博、錢鍾書父子撰為序、跋，由錢基博於民國二十年釀資刻印，復堂圖籍燼餘亦歸錢府寶藏。

¹⁶⁷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8冊，頁5750。

俞樾，猶文苑之有袁枚矣。」¹⁶⁸甚矣文人之相輕，以所操持之術相異故耶？然後知學問之事，靡有定論，要在後人隨風揚塵而已。惑乎！而後知學者之思維墮性，乃治學之大敵，能採銅於山者蓋寡矣。

¹⁶⁸ 譚獻著，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54。

文人的學術參與

——《復堂日記》所見譚獻的學術評論

蔡長林

本文旨在透過譚獻的學術評論，重新反省吾人對清代學術既有的認識與評價。在道問學風氣濃郁的清代晚期，作為一個泛覽博觀的傳統文人，譚獻既不免於深受漢學考據之風之吹拂，卻又能堅守其以文章觀學術優劣的立場，所以其評價學術之出發點，也就迥異時流，而頗具特色。從價值立場言之，譚獻最欣賞的是常州莊氏高標西漢的經術文章；從批評角度言之，譚獻又頗能運用實齋的流略學眼光排比學術之演變。值得注意的是，譚獻成功縮合二家學說，成為其觀察學術優劣的基本模式：先以流略學眼光對學問作歷時性與共時性之檢驗，再以能否表出微言大義作為學術優劣之判準。譚獻既然在批評立場上有其特殊視域，其於學術高下優劣之評，也就呈現出獨特之風格。如以文章轉變的角度論清初至乾嘉學術的變化，又如從對經典出以政治論述的視野，而批評戴震專與理學家較勁，辨析毫釐之間，是見地不高，格局不廣的表現，至於對常州學派的批評，雖有溢美之嫌理當細繹之外，譚獻讓我們明白了常州經學其學術關懷的傳統性。簡言之，其論學的假想敵並非國勢日落時的東漸西學，而是傳統學術內部演變而成的乾嘉考據大潮。至於譚獻對清初諸大儒的抑揚高下，對程朱宋學的隱隱排斥，又不必皆是是非之準，而有賴學者善加採擇。

關鍵字：譚獻 《復堂日記》 文人 漢宋 常州

Literati's Academic Participation: Reading Tan Xian's Critiques in *Futang Diary*

CAI Chang-lin

This study aims to re-examine our previous critiques of Qing research by looking at Tan Xian's diary. As one of the erudite traditional literati in the late Qing, "following the path of inquiry and study" (*dao wenxue*), he could not help but be deeply influenced by sinological textual research; yet in addition he adopted method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o assess academics. In this light, his criticism is distinctive from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value, Tan Xian most agreed with Zhuang Shuzu of the Changzhou line, in his high estimation of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ritically, he was also able to utilize Zhang Xuecheng's method of "exploring academic development from bibliography" (*liuluxue*) to rank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s. Tan Xian uniquely combined these two perspectives in judging academics. This is the basis of a model for observing academic value: first, one investigates its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spects through "exploring academic development from bibliography"; then, one decides whether or not one can draw out the subtleties of its expression as a criterion for judging academic superiority or inferiority. For example, by investigating how written articles evolved, he could discuss academic developments from early Qing to the Qian-Jia period. And based upon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classical studies, he criticized Dai Zhen, who often challenged neo-Confucian scholars on small points, on the grounds that his viewpoints were too narrow and restricted. Even though his critique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seems to be an overestimation that deserves scrutiny, it at least provides us with a way to know what concerned Changzhou scholars. In sum, what concerned him was Qian-Jia textual-critical research rather than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hina. In a word, Tan Xian's critiques of Great Scholars of the early Qing and of the Cheng-Zhu school require further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Keywords: Tan Xian *Futang Diary* literati Han-Song Changzhou

徵引書目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方智範：〈譚獻《復堂日記》的詞學文獻價值〉，收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編：《慶祝施蛰存教授百歲華誕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王標：〈譚獻與章學誠〉，《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頁65-70。
-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7年。
- 王鳴盛撰，迮鶴壽校：《蛾術編》，臺北：信誼書局，1976年。
- 平田茂樹撰，朱剛譯：〈從《歐陽修私記》考察宋代的政治結構〉，收入朱剛、劉寧主編：《歐陽修與宋代士大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皮錫瑞撰，周予同注：《經學歷史》，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
- 丘為君：《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吳子珍：《待堂文》，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4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 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 吳穎芳：《說文解字理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2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李劍亮：〈論丁紹儀對譚獻詞學理論的影響〉，《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5期，2005年9月，頁144-148。
- 李詳著，李稚甫編校：《李審言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
- 著，由雲龍輯，虞雲國整理：《越縵堂讀書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
- 汪中：《新編汪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
- 邵齊燾：《玉芝堂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1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宗靜航：〈讀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偶記〉，《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2006年，頁267-280。
- 林義正：《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年。
- 屈萬里：《書傭論學集》，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0年。
- 俞樾撰，沈松泉標點：《俞曲園先生書札》，上海：新文化書社，1931年。
-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震：《戴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胡玉縉：〈許廩經籍題跋經部之一·尚書既見書後〉，收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四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翁同龢等合記，金梁輯錄：《近世人物志》，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62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凌玲：《胡承諾《釋志》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島田虔次：《〈六經〉皆史說》，《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七）》，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袁枚：《小倉山房續文集》，《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張壽安：《〈六經〉皆史？且聽經學家怎麼說——龔自珍、章學誠「論學術流變」之異同》，收入田浩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
- 張榮華：〈章太炎與章學誠〉，《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期，頁28-34。
- 張晏瑞：《孫德謙及其校讎目錄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
-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張舜徽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
- 梁紹傑：〈章學誠對龔自珍學術思想的影響衍論〉，收入陳仕華主編：《章學誠研究論叢：第四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年。
- 章太炎：《菴漢微言》，臺北：世界書局，1958年。
- ：《太炎文錄別錄》，《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82。
- ：《煇書重訂本》，《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
- 莊綬甲：《拾遺補藝齋文鈔》，清道光十八年李兆洛刊本。
- 莊存與：《春秋正辭》，光緒八年陽湖莊氏藏板。
- ：《味經齋遺書》，光緒八年陽湖莊氏藏板。
- 莊述祖：《珍藝宦文鈔》，清道光間莊氏脊令舫刊本。
- ：《歷代載集足徵錄》，清道光間莊氏脊令舫刊本。
- ：《尚書記》，收入《雲自在龕叢書》第1集，光緒中江陰繆氏刊本。
- 陳左高：《中國日記史略》，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0年。
- 陳秋龍：《張爾田的經史思想與文化關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 陳喬樞：《今文尚書經說考》，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6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 陳鵬鳴：〈龔自珍與常州學派〉，《江漢論壇》1996年第11期，頁61-63。
- ：〈試論章學誠對於近代學者的影響〉，收入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章學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 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20-123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賀廣如：〈明代的三家《詩》學——兼論清今文《詩》學的興起〉，《人文中國學報》第15期，2009年9月，頁249-292。

-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楊際開：〈清末變法中的日本因素〉，《二十一世紀》總第109期，2008年10月，頁55-62。
- 葉德輝：《經學通誥》，民國四年刻本。
- 鄒振環：〈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收入樊樹志主編：《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 臧琳：《經義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臧庸：《拜經文集》，清同治九年上元宗氏據漢陽葉氏舊藏本。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劉師培：《左盦外集》，《劉申叔遺書》，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
- 蔡長林：〈「《六藝》由史而經」——張爾田對經史關係之論述及其學術歸趨〉，《書目季刊》第43卷4期，2007年12月，頁1-29。
- ：〈文章關乎經術——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2011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2011年11月25日。
-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 鄭裕基：〈陳澧整理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評述〉，《中華技術學院學報》第26期，2003年4月，頁232-247。
- 魯迅：《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怎麼寫——夜記之一》，《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 錢基博：《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戴震：《戴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譚獻撰，范旭倉、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復堂文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年。
- ：《復堂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類編》，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
- ：《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井上進：〈《六經》皆史說の系譜〉，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年。